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和统一战线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质

## 前 言

写这一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学习一门科学，一般都希望读到一本体系比较完整的教科书。可是，还没有一本统一战线科学的教科书。通常意义上的教科书固然没有，却有一位我们十分敬佩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模范需要我们努力去学习他。他就是已经离开我们整十年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生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他的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非常精辟的理论，早已中外交誉，正是我们学习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最好的“教科书”。

统一战线是一门涉及方面多，因而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更加广泛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内容就愈来愈丰富了；学习也就需要更加努力和持续不懈。我们是在高等学校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的教师和理论研究者，也是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成员。为了紧密联系当前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实际，不断深入学习周恩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我们采取了分专题分阶段学习的方法。现在写成的这本《周恩来和统一战线》一书，其中的 周恩来论国共合作和两党会谈的经验教训，倡议第三次合作、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论民族问题、周恩来论宗教问题，既是周恩来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作了杰出贡献的几个重要问题，也是同当前现实有密切联系的几个重要问题。本书试图概括地回顾一下《周恩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事迹，来启发我们进一步的学习。

五个专题的作者按书中排列的顺序是：一，李世平；二，魏积温；三、四，钱安靖；五，黎永泰，全书由主编李世平，副主编魏积温修改和最后定稿。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饶用虞和隗瀛涛的关心、支持，得力于苗茂华的大量组织工作。

我们写这一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不揣谫陋地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出来交流，是为了能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批评指教，以便在今后继续学习统一战线这门科学中得到逐步提高。这是我们衷忱的意愿。

编 者

1986年7月于四川大学  
统战理论研究室

## 周恩来和统一战线

## 一、周恩来论国共合作和两党会谈的经验教训，倡议第三次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史上，周恩来从实践到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直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度国共合作活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会谈，从中总结出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6 年，他又首先宣布：“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这是正式倡议国共两党通过会谈实现第三次合作，消除台湾和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的重要决定的最早文献。在周恩来的丰富著作中，有关国共合作和两党会谈的精辟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一）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国情是国共合作的最终依据历史是连续的，不能割断；所以历史的经验需要不断的认真总结，以资后来借鉴。历史又是发展的，不会僵化，所以借鉴历史经验必须立足于现实，不能原封不动地照“老皇历”办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之下，以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为基础，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随后，由于国民党当权的反动派背叛革命，实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被迫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的斗争，转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两党进行了十年围剿和反围剿的内战。随后，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之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中国人民近代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的胜利。但又是国民党当权者破坏了第二次合作，发动了全面内战；结果是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的彻底覆灭。毛泽东提到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主要就是指作为统一战线基础的两度国共合作的建立和两度被迫分裂。

两度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然而，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两度实现，尤其是两党经历了近十年内战之后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决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中国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少人也在努力探索中国的国情，以便找出更加切合中国实际的、改造旧中国的方案。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开始具备对于中国国情的全面系统的知识。近代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说过：“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周恩来把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特点加以概括说：“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从秦代开始，便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国。两千多年来，国家统一的时候多，分裂的时候少，统一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分裂则会延缓发展，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非正常的。所以，中国人民历来欢迎统一，希望尽早消除分裂状态。那么，怎样才能根本结束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的国家不统一的状态，重建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呢？对于这个近代仁人志士都在寻求解答的问题，周恩来在 1924 年的回答是：“非革命不足以图存”，而革命又必须“从国民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5 页，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8 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7—658 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2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1 页，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7 月版。

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国民革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唯一出路，也决定了能够参加国民革命的革命势力是广泛的。要开展国民革命，就要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组织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彻底战胜敌人，改造旧中国。中国有那些革命势力呢？周恩来当时认为，从辛亥革命的酝酿到爆发的历史表明，“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为最早”。然后，“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实生活的事实已经向人们证明，“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第三是中国的知识界，“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第四是新兴工商业家，虽然他们“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但“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第五“便是庞大的农民阶级”。周恩来断言：“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哪一个革命的政党适合担负统率中国五派革命势力的责任，并实现国民革命的成功呢？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资历最长的革命政党。孙中山的国民党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到1924年，已经有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达二十多年的历史，其间还包括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功绩。所以，周恩来认为“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然而，国民党的现状又如何呢？周恩来指出，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和国民党改组之前，“过去它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年（按：指从辛亥革命以来），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国民党的革命意志也大不如前，缺乏正确的政治纲领，甚至“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在这种现状之下的国民党，又当然不可能单独承担起统率五派革命势力的责任来的。

在当时，唯一代表中国新的革命势力，尤其是其中的工、农、青年学生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在中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然而共产党又还是资历不深、组织规模不大的政党。所以，只有国共两党进行合作，才能共同担负起统率五派革命势力进行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来。这就表明，国共合作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必然性的。后来，周恩来还对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各阶级进行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斗争，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因此，当时经过两党多次商谈，达成协议，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为执行联俄、联共、扶助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5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5页。

同上，第7页。

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这实在是为了共同进行人心所向的国民革命的必由之路。

历史后来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然后才有“五卅”运动掀起全国反帝斗争的浪潮，才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众所周知，然后是国民党当权者“分共”，分裂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合则两利，高则两损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曾经作出精辟的概括。他说：国共两党是“合则两利，离则两损”。“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必然，“离”是违反国情的历史错误。国民党当权者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果如何？一方面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被迫反抗。另一方面则是周恩来 1936 年 9 月《致蒋介石信》中所指出的：“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在这种形势下，国共重新合作的议题能不提上日程吗？虽然要实现两党的再度合作存在着远比第一次合作大得多的障碍，但再度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迫于燃眉的事。正如周恩来当时疾声高呼：“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出路何在？周恩来指出，历史昭示的唯一出路是“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要战，就必须“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

停止内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统一对外，共同抗日。这不仅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主张，也是“九一八”以来与日俱增的国内舆论的共同呼声。即使国民党当权者采取对外妥协和对内“剿共”的错误方针时，他们公开宣传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其中“统一方能御侮”的抽象意义还是对的。只不过他所谓的“统一”、“安内”的具体意义是加紧“剿共”，则和真正的“统一对外”南辕北辙，结果放任日寇，使其侵略步步加深。这表明，国民党当权者并非不知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53—54 页。

转见屈武：《周恩来同志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第 34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2 页。

同上，第 21 页。

同上，第 15 页。

蒋介石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时的演说，1931 年 11 月 30 日。

道“统一对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所以虽然实际上逆潮流而动，坚持军事“剿共”的方针，却又要打出“统一御侮”的旗号。直到军事“剿共”破产，日寇侵略临头的时候，才被迫停止内战，才实际上接受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到这时才说：“国民今日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益，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终于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算是基本上顺应历史潮流了。不幸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十个月，国民党当权者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使国共由合作而再度分裂，两党又经历了兵戎相见和长期对立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已先后多次提出争取台湾和大陆和平统一，建议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实行“一国两制”等合理的主张和有关的政策。第三次合作的前景怎样呢？历史发展了，国共两党的状况已经大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合作时期的状况。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都是在野的革命党，历史要求两党密切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国民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已经是执政党，是全国最大的政党；国民政府已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只是在野党，但在自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有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历史要求两党再度合作，同时也是两个政府、两支军队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抗日战争。现在，两党的状况同第二次合作时的状况已经打了个颠倒。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领导全国的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是国际上公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管辖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的政府、军队事实上只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军队。历史所要求的是，发展新时期的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消除台湾和大陆的分裂状态，完全统一祖国，齐心协力振兴中华。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因而也是不能违反的历史潮流。最近（1986年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题为《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开幕词说：“根本没有所谓‘台湾问题’，有之，则是‘中国问题’——中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不错，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但必将统一在富国利民的三民主义制度之下。”“我们肯定，这一日子不久终会到来。”蒋经国明确否定“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持主张“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这是对的。这是从国民党的立场顺应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历史潮流的明确表现。这也是国共两党已有的共同语言。有了这个根本性的共同语言，国共第三次合作便有了可能性。至于说中国将统一在所谓“三民主义制度之下”，只消清醒地看看现实，便知道这个说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神话。现实的办法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海峡两岸同胞接受起来都毫无困难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好办法。

## （二）国共合作和两党会谈的有益经验

两党的平等会谈目前，和平统一祖国虽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在统一的具体办法上，两党的主张还有差别，还存在着是否现实的差别。有什么适当的方式可以消除或逐渐缩小两党在具体办法上的差别，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目标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邓小平提出的：“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通过平等会谈，协商缩小以至消除差别的方法，达成一定的协议，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上国共合作的有益经验的公平合理的建议。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度合作的建立和发展，都是通过两党不断举行平等会谈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党人就多次主动同孙中山会谈，结果达成了以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两党之间的会谈一般表现为在国民党内讨论的方式，但由于保留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存在着共产党以平等的友党地位，从党外对国民党进行批评、提出建议和互相协商的方式。一个颇有意思的历史事实是，首先提出规定两党正式采取固定的平等会谈的形式的是蒋介石。1926年5月，蒋介石等九名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得到会议一致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根本目的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以便由他们自己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决议案》也以“改善”“两党合作”关系为理由，“特提议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具体规定是：“（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三）国民党党员对于共产党党员，或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四）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等等。这个以改善两党合作关系为名而组织的两党联席会议，虽然最终并未阻止国民党当权者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有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但两党联席会议的设立一事，也可以作为历史经验来看。蒋介石提议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国共两党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承认涉及两党的“各种重要事件”应由两党的全权代表举行平等会谈，达成协议，共同分别执行。如果不遭破坏，两党联席会议本应有助于两党更好地合作下去的。

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两党代表在西安事变前后已开始进行若干次会谈。合作关系实现后，两党之间的会谈也多次举行。由于国民党事实上一直未承认两党的平等地位和双方的平等会谈性质，而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因此，两党的多次会谈都未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到了1945年3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刚透露出来，蒋介石就接连三次打电报给延安，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商同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

国家前途实赖之”。无论蒋介石的主观打算怎样，客观上，这是国民党当时的领袖蒋介石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承认，中国的国家大计和国家前途，必须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平等会谈，由两党领袖“共同商讨”，“共定大计”才行，并不是只需国民党说了就算事。尽管国民党蒋介石的根本企图是要通过会谈达到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的目标，而采取公开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和两党的平等会谈的态度，也是迫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但既然承认两党平等，总算是顺应了中国国情和历史潮流。是做得对的。

两党会谈的四点经验教训要合作就要会谈，要会谈就要平等。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两党的平等会谈，以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呢？周恩来在 1946 年 1 月，根据他代表中共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参加两党多次会谈的丰富实践，科学地总结出四点经验教训，即“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四点经验教训既总结了历史，也为当前争取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和平统一祖国问题，以及发展新时期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理论指导。

可以说，上述四点的每一点的前半句都是有益于合作和会谈的经验，后半句则是不利于合作和会谈的教训。四点经验教训中最根本的是第一点，即必须首先互相承认而不要互相敌视，才有可能使其余三点顺理成章。当然，也要全部四点都得到肯定的对待，才能收到平等会谈和加强合作的积极效果。互相承认，就是两党都要采取现实的态度，承认对方的既成事实，不是要求对方承认自己并非事实的东西。承认对方的既成事实不等于赞同；可以不完全赞同，甚至完全不赞同。但要会谈两党的合作问题，就只能以首先互相承认双方的既成事实为先决条件。这才有举行会谈的基础，才能在会谈中互相商量，互相让步，达成某些改革现状的协议，或者在未能取得协议时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不是互相抵消的前提下进行互相竞赛，让事实和时间来判断是非优劣。毛泽东曾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国共会谈与合作中的全部有益经验，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的结果。

中共对三民主义的历史态度周恩来在 1946 年 1 月向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报告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会谈的四点经验教训时，列举了共产党方面当时早已承认国民党方面的四点主要的既成事实，就是中共按照“既统一，又独立”的正确方针，实现和保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益经验和成功例证。第一，中共方面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不是三民主义。周恩来说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sup>①</sup>这里说的还是共产主义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差异，不是同孙中山逝世后某些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所作的其他解释相比较。但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阶段，

---

重庆《中央日报》1945 年 8 月 16、20、23 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11—11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 页，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8 月版。

《六大以来》上，第 844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由于中国共产党所要完成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执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还不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任务；又由于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新三民主义接受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所以，尽管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还存在上述的同共产主义的差异，但它“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把它作为国共合作和当时整个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是最恰当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承认它是“中国今日”即民主革命阶段之必需，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但多次重申过这个承认，“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为冲突而抛弃自己已经承认的信念”。不仅是自己努力求其实现，中共方面还多次要求国民党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不要把三民主义当作口头禅。今天，台湾的蒋经国赞成中国和平统一的前提，却主张中国要统一在三民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可以不去深究国民党在台湾究竟是真正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是把三民主义当作口头禅。但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早已在整个中国大陆胜利完成，共产党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诺言早已兑现，三民主义当然不再是“中国今日之必需”了。今日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早已是全世界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在外交上公开承认的既成事实。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承认举世公认的既成事实，却要求别人承认他们提出的并非事实的东西，实在是可笑的鸵鸟政策。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是毫无现实意义的神话。当然，如果国民党要在台湾保持“三民主义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那是可以承认的，因为这是既成事实。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宣布过：“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人是信守诺言的。中共对国民党及其政府、领袖的历史态度周恩来列举的当年中共方面承认国民党方面的主要既成事实还有：第二，承认蒋介石当时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第三，承认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党；第四，承认国民政府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外代表中国。这三点都是当时国民党方面的既成事实，却又是中共方面并不赞同的。因为，按照国民党的《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约法》的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真正“国民”的政府，蒋介石实行个人专制独裁，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中共和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不能赞同，而且一直要求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既要合作，就只能首先承认既成事实。正如周恩来所指出：“因为承认是一事，承认了并不等于这些部队就不能整编，这些地方政府就不能改选。”这是就国民党

---

同上，第 5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1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1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1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7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12 页。

方面对共产党方面的承认和要求而言，中共方面对国民党方面在道理上也是一样的。只有从互相承认既成事实出发，才能合作，才能举行两党的平等会谈，才能互相提出改革的要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始终承认国民政府和保证不以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前提下，两党多次举行会谈，中共都“只是要求改组政府”。<sup>1</sup>例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间，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时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以后并未兑现）；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的“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以及1946年1月中共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必须立即扩大现有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都是在承认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先后提出的改组政府的主张和要求；改组以后是“联合的国民政府”，即真正的“国民”的政府，并不是要推翻国民政府。不仅如此，中共方面还相应地主动让步，取消了国共合作以前同国民政府对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把抗战以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在敌后陆续建立的各个抗日民主政府作为地方性的政府；始终没有树立另外一个领导的中心政权”；主动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中共方面承认国民党方面的既成事实，不加敌视，并作出重大让步，都是信守始终的。事实俱在，有目共睹。

国民党对中共的两面态度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对中共采取了两面性的态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剿共”内战被迫停止了。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一方面把“和平统一”定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说是要“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困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权主义之大道”，另一方面又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还专门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的决议案，提出了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一方面表明国民党坚持反共方针，不愿意公开承认共产党；另一方面，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把中共方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四点主动承认和主动让步，变换成国民党对中共提出的禁令，事实上却初步承认了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政府的存在。正如后来周恩来评论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

---

同上，第32页。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月24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12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29—43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政权。”从国民党三中全会到抗日战争爆发约半年之间，周恩来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多次举行会谈，都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几经周折，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才正式承认了中共领导的军队，颁发了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的番号和建制，一段时间提供了一些经费和装备；正式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才正式形成，而抗战初期的“两党关系确实一度表现出相当的融洽。”是怎样取得这一步成就的呢？周恩来指出：“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人民力量逼成了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也就再次证实国民党无力抗拒历史潮流到底，证明国共合作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而蒋介石的反共思想不变，又证明他始终没有彻底顺应历史潮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历是复杂的，曲折的。武汉失守以后，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反共活动加紧了，秘密颁发一系列反共条例，公开制造“取消共产党”的舆论，搞武装“摩擦”，包围和侵犯抗日根据地，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直到发动“皖南事变”，撤消新四军的番号等等。只是迫于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国民党才没有公开分裂，才宣称所谓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的方针，也就是继续采取两党和平会谈的方式来解决两党分歧的方针。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始终坚持的是抗战、团结、进步，反对的是妥协、分裂、倒退，从来不曾关闭谈判之门。西方愿意会谈，也就是继续互相承认的表现形式。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多次会谈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承认在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和抗日军队，国民党则要求改编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队和改组敌后抗日政府。国民党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取消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直到完成所谓的“根绝赤祸”。不过，国民党既然向共产党提出了改编、改组的要求，实际上还是承认了共产党及其军队和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人们总不可能去向并不存在的东西提出改编、改组之类的要求。所以，不管国民党的要求合理与否，中共方面从来都不拒绝谈判。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经历种种困难和曲折而能保持到抗战胜利之后，除了主要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外，也由于国民党迫于形势，在执行反共方针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取消对中共的承认，没有关闭两党会谈之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的可喜成绩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电毛泽东赴重庆举行两党最高级别的会谈。如前所述，其客观效果是国民党第一次公开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事关国家大计”的种种问题，必须两党平等地“共同商讨”，才能得到解决。虽然蒋介石此举的根本目标是要“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即最终取消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1页。

同上，第82页。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3页。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9日。

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军队，并且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发动了进攻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内战；但是，历史证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一举是值得肯定的，而在互相承认的前提下在重庆举行的两党平等会谈的气氛也是友好的。在8月28日晚上蒋介石为毛泽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两党平等友好的会谈，果然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可喜成绩。10月10日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解决了一些过去两党多次会谈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按照周恩来的归纳：“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这样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当然还有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国民党仍然不承认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当年周恩来向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报告时感慨地说，从国共会谈的经历中间，“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然而，历史也证明，无论怎样困难，只要能够互相承认而不再互相敌视，只要两党举行平等友好的会谈，毕竟能够取得某些可喜的重要协定。以《双十协定》为良好起点，陆续有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同日，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于1月底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2月25日，由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3月27日，又由国共双方签订东北停战协定等等。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能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通过两党（或加上其他党派）的平等会谈，达成这样多重要的协议，在历史上实属仅有。这些协议都是可喜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周恩来曾经评价说：“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说，如果政协决议和上述其他协议能够认真执行而不遭受破坏，那么，和平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应该是有希望的；国共两党继续长期合作，也应该是有希望的。

---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2—253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11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

### （三）国共再度分裂的历史教训

国共再度分裂的原因是国民党坚持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国共第二次合作毕竟由于国民党方面的破坏而分裂了。国民党的破坏是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不久，从撕毁国共和其他党派共同签署的政协决定，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协议和其他协议，即从实际上取消他们对中共方面已有的承认而开始的。接着，国民党便发动全面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然后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强迫中共谈判代表和其他人员全部撤退，并宣称以后对共产党人要“作为匪徒间谍治罪”。这就最后彻底地从法律上和事实上完全取消对中共方面的承认，代之以绝对的敌视。

国共再度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很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坚持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两党“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这两个基本方针的性质各异，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不能调和，又“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有利于团结、合作；国民党顽固坚持其基本方针，则必然导致分裂。“但是否双方没有谈判可能与妥协的余地呢？这就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变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对于这两个基本方针，还需要分别进行具体分析。国民党当权者的“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是一贯的，根子在早已明文规定并始终坚持他们的政权——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的性质。一党专政的基本内容就是他们历来公开宣传的“以党治国”、“以党专政”、“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外无党”、“根绝赤祸”等等。既然从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已是国际上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其必然的逻辑就是绝对不能承认，并一定要消灭事实上已经在国内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以及其他不依附国民党的政治力量。这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分裂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为什么就在国民党始终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关系又从十年内战的阶段进入到第二次合作的阶段，并能保持合作达十年之久呢？可以说这是国民党力不从心。国民党在主观上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在客观上是完全违背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潮流，从来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二十二年间，从来不曾，也无力把人民所不赞同的一党专政的统治体制实际推行到大陆上所有的地区，南京或重庆的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十年军事“剿共”和三年全面内战，都只能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所以，周恩来指出：“反动集团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它实现，那就走些迂回的道路。”因而，即使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也并非“没有谈判可能与妥协的余地。”在一定的客观形势下，还是能够实现并保持两党的合作。究竟是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0页。

同上，第261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1页。

合作还是分裂，国民党当年作为执政党，尤其是它的当权者，无疑是处在决定的位置的。周恩来 1936 年 9 月致蒋介石的信中恳切地说过：“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由于国民党当权者的一党专政和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违背中国国情和历史潮流，不得人心，所以他们除了在国共分裂时期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肆宣传外，在国共合作期间则“不能公开提出来”，“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只能搞两面性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潮流的，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以及许多中间党派的拥护和赞许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却公开把我们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拿出来，光明正大地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中共早就把自己的基本方针公诸于世。周恩来说、“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中共在“七大”以前就公开提出了联合政府或联合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在 1944 年 12 月 15 日便公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周恩来说的“将反动阵营压下去”，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起来要求国民党当权者改变一党专政的现行政策，并不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和取消国共合作。相反地，改革国民政府的现行政策，改革中国的社会政治，正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后来，刘少奇把当年中共贯彻“七大”方针的打算分析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协议。……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们，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1949 年国共谈判的历史教训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不惜发动全面内战，彻底分裂国共合作，结果却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被彻底消灭。中共坚持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方针，虽然遇到国民党内战、分裂的破坏，却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打败了国民党。到了 1949 年元旦，眼见大势已去的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发表了文告，提出国民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重新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按照周恩来总结的两党会谈经验教训的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可是，蒋介石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2—23 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61 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61 页。

延安《解放日报》1944 年 12 月 16 日。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04—205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

石的文告内容不但继续极端敌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完全不承认两党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既成事实。当时，共产党方面的变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艰苦作战，先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除收复一切被国民党军队一度侵占的解放区失地外，还新解放了大片国土和包括石家庄、洛阳、济南、郑州、开封、沈阳、徐州、唐山等的许多城市；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人民解放军不仅早在质量上而且也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在广大的新老解放区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正式宣告：“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相应地，国民党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已不再是全国第一大党；它的统治地位早已动摇，即将崩溃；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基本相同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由共产党在解放区使之“彻底的实现”，并将使之在全国实现，而国民党的种种行为则完全背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就是国共两党状况已经迅速变化的主要既成事实。蒋介石在文告中故意不顾客客存在的事实，无中生有地提出要中共“确保”他的“国体”、“法统”、“军队”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即要求中共方面“确”实“保”证他在中国大陆上已基本被消灭了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和军队力量得到维持和恢复。这是从何说起呢？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月14日的正式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原来，蒋介石的基本方针不仅照旧，而且更加直言不讳。其目的显然不在求和，而是有意刺激中共，以便把拒绝和谈的责任推给中共，借以制止国民党内主和派要他下野的企图。

中共方面在揭露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的同时，仍然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共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八条作为谈判基础：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仍是中共“七大”的基本方针，也是完全符合当时两党已经根本变化了的实际状况的合理主张和谈判基础的基础。

1月19日，蒋介石在他的虚伪求和被彻底揭穿，外遭美英等国拒绝支持，内遭国民党内主和派反对的情况下，被迫“引退”。他宣称：“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次日，代理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李宗仁宣布承认中共八条作为商谈基础，似乎也是基本上承认了国共两党状况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此来表明他对和谈是有诚意的。在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到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两党会谈后，4月7日，李宗仁又电毛泽东，说他“决遵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认为“国共合作，尤为迫切。”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93页。

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说：“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这是说，中共同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一切爱国者合作的愿望是始终不变的，但在当时，要实现毫无界限的国共合作，则还需要考虑现实的条件是否成熟。为什么呢？因为坚持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的蒋介石还在幕后操纵一切，李宗仁虽然宣布承认中共八条为和谈基础并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但他所准备的，由张治中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取得支持的和谈“腹稿”表明，他的真正意图是：“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党共存条件下讨论八条。”李宗仁还说：“我完全清楚，即使这个建议被接受，共产党也不会和我们谈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阻止他们过长江，他们就别无他法，只得接受我们的建议。”这就是说，李宗仁主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立刻停止解放军的胜利攻势，阻止解放军过长江，以便实行划江而治，分裂中国为两个并存的政府，而否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李宗仁实际上仍然基本否定了中共八条，即基本不承认国共两党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既成事实。这样，连李宗仁自己也明知这次和谈不可能成功，还提“国共合作”干什么呢？而在国民党统治面临全面瓦解的时刻，企图划江而治、分裂中国的目的又是为什么？仍然只能是蒋介石一样的“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仍然是贯彻蒋介石的“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无怪乎南京政府终于拒绝了两大代表团经过谈判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两党对待历史教训的不同态度历史的教训如此清楚，很值得国共两党都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蒋介石在1956年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这样总结国共关系和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彻底覆灭的历史教训的，他认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国民党没有对中共“予以绝对的隔绝封锁”和“作彻底处置和根本解决”，即当时没有按他的基本方针彻底消灭中共，是国民党后来失败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完全颠倒了历史逻辑顺序。恰是国民党1927年以来虽然始终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但到了抗战前夕，由于力不从心和迫于形势，承认了既成事实，接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其结果不是国民党的失败，而是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都有功于国家民族，也有益于两党自身。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公开承认国共两党的平等地位是做得对的。两党因此共同取得包括政协决议在内的若干重要协议，为两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和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开辟了美好的前景。这些是应该肯定的有益经验。相反地，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中共的基本方针，冒天下大不韪，悍然撕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分裂国共合作，结果是使国家遭难，人民受苦，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也随之全面瓦解。硬要颠倒如此清楚的历史逻辑，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民族更是绝无好处！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正确对待的态度。虽说是国民党当年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其他协议，最后分裂了国共合作，周恩来在1946年12月12日于延安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仍然强调说：“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

---

《将革命进行到底》单行本，第130，131页，解放社1949年5月版。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44页，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

康庄大道。”六天后，周恩来在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总结了国民党分裂的历史教训；“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但我们不管他将来谈得好谈得不好，政协这一条路线，我们还是不变的，不能放弃的。”“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说政协路线不能变，就是说“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可见，周恩来代表中共，从国民党搞分裂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了多么深刻的积极性的结论。结论的积极意义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一定要“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另一方面，今后共产党也要更好地按“三三制”的思想办事。周恩来以“政协路线”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在抗战时期提出来的“三三制”思想，认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在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上，共产党和国民党是这样的不同，其后果也就迥异。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正式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人士广泛的热切响应。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其他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人在内的爱国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同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也可以说就是坚持周恩来提出的“政协路线”所决定。所以，邓颖超强调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同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党一贯的方针，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可以看出，周恩来科学总结的国共两党合作和会谈的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多么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我国新时期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在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上，无疑还将继续发挥有益的指导作用。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3页。

同上，第255页。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19日。

邓颖超：《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1983年6月。

#### （四）展望和平统一祖国和国共第三次合作

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就展望了和平统一祖国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前景。1956年1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同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他进一步展望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预期国共两党“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当时的习惯语“和平解放台湾”，就是说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就是和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956年的中国面貌同整十年前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相比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东方，得到国际公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早已完全崩溃，只控制着相当于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稍多的台湾省。为什么这时周恩来号召和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展望到“可能性正在增长”呢？最根本的依据仍然是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历来都是在深刻理解中国国情和历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制定的。周恩来指出：“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这就是说，基于中国的国情，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会谈，实现两党合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原则性的主张。

周恩来具体分析台湾和大陆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缓和，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周恩来同时正式向台湾国民党表示：

“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的确，历史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历史趋势，两度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18-320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0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18—319页，第320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18—319页，第320页。

促成了国共合作，又第三次提议两党进行商谈，“重新携手团结起来”。国民党两度抗拒历史趋势，两度破坏国共合作；但也曾两度顺应历史趋势，两度接受国共合作。国民党的一再反复仍然证明历史趋势终究是不可抗拒的；顺应或抗拒历史趋势的后果是不同的，无须再证明。然而，台湾当局竟又一次拒绝周恩来代表中共一再提出举行国共会谈，和平统一祖国和两党重新合作的建议，反而顽固地提出他们的军事“反攻大陆”的方针，又一次放走了顺应历史趋势的良好时机。

历史又发展了。当前，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比1956年有了更大的增长。国际上的和平趋势在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得到了从联合国到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在国内，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并正在发生非常可喜的变化。国内人民看见了，全世界也都看见了。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国内经济建设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已为解决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两制”的新构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在新时期不但继续发展周恩来生前的号召和主张，已经多次建议台湾当局，由国共两党举行平等会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最后消除台湾和大陆的分裂状态，特别是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构想。这个新构想的根本特点是尊重事实，尊重实际，首先是充分尊重台湾和香港的历史实际，因而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构想，也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解决历史争端的最开明的新办法。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经过中英两国的协同努力，香港问题已经圆满解决。这证明“一国两制”的构想确实搞对了。而且这个构想所体现的和平共处的精神，不仅在解决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也在解决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争端问题上，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肯定，“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已经为台湾和大陆的和平统一开辟了更为现实的新的道路。

香港问题是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台湾问题则是台湾和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一国两制”构想的内涵对于台湾比对于香港更宽。对于台湾来说，“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在不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对内政策上可以自搞一套，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台湾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湾，不仅军队不去，行

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任职的名额。

为了取得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协议，中共中央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现两党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大陆和台湾，就一国之内的两个政府而言，当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

系，恰和抗日成争时期两党各自领导的政府的关系对换了位置。这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现实。但就政党而言，一国之内的各政党，无论何时，无论大小，执政与否，都是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的关系。当然有一个谁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党和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但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又都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律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是通过民主协商、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政治思想工作来领导，同时又放手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活动。不言而喻，实现和平统一之后，国民党作为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执政党，同国内其他政党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以及它在组织上的独立自主，都有充分的保障，是完全肯定无疑的。

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难易问题台湾当局历来主张“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所谓“台湾独立”；近年来已经不提军事“反攻大陆”的神话。所以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中共方面提出“一国两制”的合情合理的新构想以后，和平统一的前景更加明朗。目前，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究竟是难是易？还有哪些阻碍和平统一的因素？根据海内外包括台湾方面的各种议论，大约可以综合出下面四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不信任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国共两党之间长期互不信任，这是由来已久的客观事实。加以台湾当局目前继续用高调反共；把中共方面历年来反复提出的所有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合理建议和各种真诚的措施，一概贬为“统战阴谋”；拒绝“三通”（通商，通邮，通航），坚持“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近来还有对付国际组织的“新三不”（不接受，不参加，不退出）：同时采取封锁真消息和制造假消息的办法来蒙蔽和煽动台湾同胞对大陆产生疑虑。这些当然都是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因素。不过，历史也早就证明，不信任的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阻碍国共合作的实现。周恩来总结历史上国共合作和两党会谈的四点经验教训中，并无“互相信任”这一点。那是因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并非以互相信任为前提而建立的。相反，从合作以前到合作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两党始终未能达到互相信任的程度，但两党合作却不仅建立，而且保持了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已在前文论及，是由于中国的国情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不在于信任与否。如果台湾当局真能象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人人放眼于中国统一的千秋事业之远大”，承认基于中国国情的祖国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则一切均可谈判，不信任的因素便不是阻碍和平统一的因素。而且，由于不信任而拒绝“三通”，坚持“三不”、“新三不”的现状，已经逐渐由默认转口贸易，“奥运会模式”，海峡两岸学者在海外接触，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在香港会谈，出现亚银会籍问题，国际刑警组织会籍问题；以及愈来愈多的台湾同胞与大陆亲友通信、回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游、洽谈贸易、交流学术等活动，开始从实际上冲破了。民间的接触、了解和信任的逐渐加深，必将促进台湾当局改变他们的僵化政策。这就是历史潮流。第二，信仰不同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信仰不同，历来如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国共两次合作期间，共产党人承认基本上符合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但共产党人仍然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当权者则始终反对共产主义。那时，两党的根本信仰不同，并不妨碍国共合作的两度建立。在目前，信仰不同问题确实比当年更加尖锐了。中国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同民主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无共同之处，当年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共同纲领在现阶段已毫无可能性。台湾呢？那里一千多万人口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民党称之为三民主义制度，同时继续用高调反对共产主义。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五点主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对外关系五个方面。虽然其大部分内容都是搞片面宣传的废话，但本质的主张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改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由台湾吃掉大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现实的神话，许多海外华人以及台湾同胞都认为是十分可笑的。但这正表明，两党在信仰不同上确实更难于调和了。怎么办呢？如果按历史上的老办法，双方不可能调和而又硬要统一，就不外是我吃掉你，或是你吃掉我。国民党过去曾经两度发动内战，企图彻底吃掉共产党；共产党则两度被迫武装自卫，最后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彻底消灭。这就是用老办法解决无法调和的问题的历史例证。现在，实现祖国统一的方式仍然可能有两种，即和平解决的方式和武力解决的方式。中共宣布争取用和平解决的方式，这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世界和平有利。使用武力解决的方式，即吃掉对方，对国家，对世界和平都有损，所以尽量不用。但不能向外国保证，因为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既要争取和平解决，又有无法调和的难题，这就不能钻死胡同，就需要打破陈规，寻找新路子。“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就是从实际出发创造出来的新路子。按照这个新的构想；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种制度，十亿人民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千多万同胞的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另两种制度在一国内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谁也不吃掉谁。在信仰上，台湾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当然不受干涉，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更是理所当然。两种不同信仰也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可否互相批评呢？也可以。共产党历来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不要超过意识形态的范畴。邓小平提出一个假设，如果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尚未完成的话，他主张：“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共产党不怕骂，共产主义不怕批

评，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既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也不搞“闭关政策”，不是排外的。共产主义者是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当今成果）的真正承继者。毛泽东早就提倡：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大陆研究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历来是自由的、热心的、广泛的，历来欢迎台湾和海外的中外同行专家同大陆进行有关学术的交流，互相切磋。可见，国共两党的信仰不同，历史上未能阻挡国共的两度合作；现在形式上似乎更不可调和，但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便不成其为和平统一的障碍了。

---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4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第三，经济差距问题。目前海峡两岸的经济生活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这是客观事实。能不能说这就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障碍呢？抽象地讲，似乎是的。如果加以具体分析，就不一定是了。关于形成两岸经济生活目前的差距的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关于两种社会制度本质上的优劣以及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不可比的因素，还有目前大陆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等等，这里都无须详说，因为人们很容易想到这些道理。需要着重说说的是，认为经济生活上的差距一定会阻碍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的说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也不符合台湾人民在近代史上一贯表现的爱国行为。台湾在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被迫订立马关条约之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达五十年之久。台湾人民进行过多次抗日爱国斗争，争取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从未嫌弃当时的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落后。终于到了1945年8月，海峡两岸人民共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台湾的经济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书中说：“因为日本已经把该岛丰富的自然资源用于建设，该岛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大陆的任何地方。它拥有良好的工业系统，粮食不仅可以自足，尚有剩余。”可见，台湾和大陆在经济生活上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而拉开了差距，由来已久，并非目前的新鲜事情。当年台湾人民是否由于经济生活高于大陆任何地方而改变他们和大陆同胞团聚的夙愿呢？历史的答案是：“该岛人民的主要希望是和大陆的同胞再行团聚。”——要证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引用的资料多得很。这里只引用美国白皮书的记载。主要是借此提请某些以为海峡两岸经济生活有差距就对台湾和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摇头的外国朋友注意，美国国务院在当年敌视中国人民的时候，也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提供了证明：海峡两岸的经济差距，从来不是中国统一的障碍。如果硬要坚持说这是障碍，那是在歪曲台湾人民的爱国传统。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目前中共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好办法。按照这个办法，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自成一体，自搞一套。不但保证台湾目前的繁荣和稳定一切照旧，而且海峡两岸在统一的祖国国内加强经济协作，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相竞赛，必将促进台湾经济更加繁荣。可见，海峡两岸经济生活的差距，过去不是，现在就更不会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障碍了。

第四，台湾当局还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当前，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可以说是易有难。说易，是说在“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以后，已是“万事齐备”。首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意愿，是和平统一的根本依据；其次，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至于两党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问题，两党的信仰不同问题，海峡两岸的经济差距问题，都已经不能构成和平统一的障碍。这不是“万事齐备”吗？说难，就是“只欠东风”，只欠台湾当局正视现实的勇气。本来，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只要求双方互相承认既成事实，不要求改变任何现状；双方只有好处，没有任何损失，这是最公平最现实的办法。要求台湾当局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是承认早就举世公认的事实；要求台湾当局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是放弃一个并非既成事实的幻想，放

弃一个毫无现实感的神话，放弃一个只能引起世人发笑的大言不惭；而不是放弃台湾当局的任何既成事实，也不损害任何实际利益；相反地，是充分保证国民党和台湾的一切既成事实。说实在的，不但是现在，就是在历史上，当南京或重庆的国民政府被当时国际上承认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二十二年间，也从来不曾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过；他们自己在过去，在现在也都从来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中共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仍然承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当时中国所必须；不但勇于正视现实，而且在行动中认真实践自己的诺言。今天国共两党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要求互相承认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放弃不现实的神话，真是天经地义，再合情合理没有了。所以，“只欠东风”，就是只欠台湾当局勇敢地正视现实的决心。为了使台湾当局能下勇于正视现实的决心，也不妨等待他们一下；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评论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用高调反共的言论时所指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他不得不这样说。”应该体谅他“不得不”的难处。实现和平统一不能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也要促进他们早下决心，正视现实。中共方面早就提倡多方创造条件，促使双方接触，增进了解；了解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以便增强他们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决心。周恩来在1956年就正式宣布：“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进行和平统一的会谈；希望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可以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又是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中共方面提倡增加接触、增进了解的态度始终如一。邓小平十分坦率地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的。如果他们能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以及一切致力于中国统一事业的人，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希望国民党当权者勇于正视现实的东风早一点吹起来，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的“千秋事业”，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贡献，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作贡献。

---

新华社北京1986年4月2日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化》第321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8—19页。

## 二、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不仅科学地估计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且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和生活上的疾苦。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高尚的作风，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主动地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杰出的理论贡献和伟大实践，使他成为共产党团结知识分子，发展统一战线，作好统战工作最杰出的第一个模范。

周恩来虽然已经逝世，但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财富和伟大实践之一。它对于清除革命和建设中对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着的“左”倾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制定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实行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完成收回香港主权的历史使命，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大业，提出我国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等等。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在一九八二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今后的长时期内，统战工作的对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统战工作的范围不是越来越狭小，而是越来越宽广。”统战工作的对象有：一是民主党派；二是无党派的知名人士，其中主要是爱国人士；三是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四是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五是原工商业者；六是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七是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八是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上的家属和亲友；九是港澳朋友；十是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等十种人，其数量将近一亿人。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随着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统一战线范围、对象、团结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在这些广泛的统战对象中，有较大的一部分人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些集体，如各民主党派、原工商业者等基本上是一些知识分子集体，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分别由具有不同条件、不同层次知识的人集合在一起，就使这些党派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多方面人才的智力集团。这样，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否正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程度如何，就直接关系到各项方针、政策的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成；直接影响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由此可见，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能鼓舞广大知识分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对国内人民有深远的教益，而且对台胞、港澳同胞和侨胞，对国外朋友也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是历史对代的需要。

## （一）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统一阶层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25年6月，周恩来就严肃地批判了“知识阶级”这个错误的提法。他说：和军队一样，“知识分子也是工具，他不生产，同时也不是掠夺别人生产而成为自己的生产的。完全不是个阶级（着重号是作者加注），只可说他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又说：“压迫者利用知识分子来想法压迫人，被压迫者也可利用知识分子来反抗压迫者。”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个阶级”的思想，是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状况的正确观点；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这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理论的科学总结。在建党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幼稚的甚至是十分错误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所有联系。”这不仅是把知识分子完全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而且要求断绝同知识分子的“任何联系”，显然是一种幼稚的孤家寡人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知识分子问题则由“一大”时的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的任何联系，转而把学生与工人、农民、商人、兵警诸君并列，作为革命动力之一；但又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知识阶级”这样一个不科学的概念。此后，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翟秋白，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专门论证中国“知识阶级”的问题。文章中还提出“旧知识阶级和新知识阶级”的概念。他说：“五四”运动是卖国派和爱国派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一大高潮。他将“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分为旧知识阶级和新知识阶级，宗法社会以政治以议员为职业的士绅、“高等流氓”是旧知识阶级，而那种“欧风美雨”、学校的教员、企业的职员和青年学生是新知识阶级。新知识阶级的健将是学生界；旧知识阶级的镖师是官僚。同时，文章还指出，新知识阶级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们始终是社会的喉舌，但无论如何做不得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也发表了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提出，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又把他们划分为“旧的士的阶级”和“新的士的阶级”。他说：“‘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同时指出：“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陈独秀还进一步的解释说，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士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比欧洲中世纪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

---

《周恩来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第5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

《六大以前》第47页，第48页。

及。”这就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完全同贵族、僧侣等同看待，甚至比欧洲中世纪“僧侣阶级”还要更坏一些。由于上述种种错误看法在当时共产党内有较大的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个阶级”的正确观点和意见未引起重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的思想，是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通的。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时，不仅始终坚持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一个阶级的观点，而且认为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他虽然没有全面地分析旧中国知识分子属于那几个阶级，但也指出了，有一部分是属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知识界”，有数量众多的归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阶层”，其中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司员、小事务员、小律师等。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科学论断。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他把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具体地区分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状况，把知识分子科学地分别划归于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即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正确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所作的阶级分析的正确理论，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个阶级”的思想一样，没有真正被人理解，特别是在共产党内没有统一的理解和接受。因而，在共产党内往往出现或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革命高潮时期的革命热情估计过高，或对他们革命低潮时期可能出现的分化、动摇缺乏思想准备这样两种错误的倾向。

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的这个观点的坚持和发展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1957年之后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个时期，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出现了重大的曲折和反复。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使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此之后，又提出我国现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是新社会培养的，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还是工人、农民家庭出身，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反对社会主义、对抗无产阶级的主要社会力量。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中说：“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经过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的严重斗争，多数人也大大减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至于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

---

《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第660页。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05页，人民出版社。

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还多一种资本；他们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的种种部门需要他们”。

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不仅是把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划归于资产阶级范畴，而且是直截了当地把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完全划归于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仅把广大知识分子看作是“改造”对象，而且把知识分子看作是“革命”的对象。由于把广大知识分子完全划归于资产阶级范畴，并认为他们主要的是“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知识分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作为阶级斗争的重点对象了。显然，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统一阶层的观点的。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新形势下，严肃地批判了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的观点。他郑重宣告：经过十二年锻炼的我国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当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同时，他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个阶级”的思想。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当然，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在不同的社会里其具体状况是不相同的。一般他说，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奴隶制社会里，他们为奴隶主阶级服务，在封建制社会里，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为资产阶级服务。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是怎样产生的呢？周恩来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因为，只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因此，“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和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这就造成，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这也就是说，即使在旧社会里，也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找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新兴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遭到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迫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由此可鬼，知识分子不仅不

---

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6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4—356页。

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状况也是不同的。坚持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的观点的重要意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这是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属于各阶级的知识分子状况的正确结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方法是无产阶级认识社会现象，分辨敌、我、友，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方法。因为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又是分为阶层的，在不同的阶级之中包含着不同的阶层。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总是一个依附于一定阶级的阶层。考察历史上的各个阶级，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无论属于那一个阶级，由于具有专门知识的特点而统归于一个阶层（即知识阶层或知识界），又由于分属于各个不同阶级，具有差别性，而区分为不同阶层。因此，不仅不能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也不应该把具有不同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当作社会中一个统一的阶层。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你们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相题并论，那就是说，你们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即象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社会集团。”那种把知识分子完全看成是一个阶级的观点，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

历史证明，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坚持这样的区别和划分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根据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本质区别制定的。毛泽东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个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事情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和研究的态度。”如果不研究、不分析和不区别界限，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阶层，又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属于某一个阶级，那就会把复杂的阶级状况和知识分子状况单一化、纯粹化。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知识分子政策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要犯一般化、“一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事实上，各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各不相同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对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作具体地分析，采取不同的政策。

---

《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17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4页。

## （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属于劳动人民范畴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解放以前还是在解放以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知识分子，虽然如列宁所说是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这里仅仅就知识分子是不是劳动者而言）但是，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劳动阶层，则是十分清楚的，也是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周恩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可惜的是，“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因而，无论是解放以前或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对待知识分子是否是劳动者的问题上，都曾出现过“左”的或右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初期，没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劳动者。例如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提出入党后要有后补期的“非劳动者”，就是指知识分子。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定，在“非劳动者”后面特别注明，是指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特别是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消极动摇，有少数人甚至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接受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的错误观点，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党的领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代表”，还认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一定做出错误”。从而错误地全盘否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使这种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192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号开紧急会议，即“八七”多会议，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但又产生了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绪。大会的决议把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认为完成革命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公开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此后，这种对待知识分子“左”的错误由思想认识变为具体行动，错误又进一步发展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并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认为，“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的策源地”。因此，提出要以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农的成分占最大多数”。这就使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在全党普遍推行。192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和任务，对“左”倾错误也有所批评，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还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中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58—359 页。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 22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 6 月。

《中共党史参虑资料》第 5 册，第 149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80—181 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5 册，第 298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完全否认了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动力。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上搞唯成分论，“太重视工人成分”。“六大”的七十五名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其中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不多。会议选举出的三十六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二十一人。许多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很强的知识分子干部，如刘少奇、恽代英等，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是造成“后来中央很弱”的主要原因。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更加发展。一方面，提拔那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钦差大臣”到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去“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另一方面，错误地排斥和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干部；指责中央苏区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大多数仍然操纵在知识分子手中”。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由城市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进一步地推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左倾错误纲领，要“严格检查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社会成份”；污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是“富农路线”，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还把排斥知识分子和错误的肃反政策混在一起，在党内机械地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政策，犯了“简单检查成分，乱洗刷党员，乱处罚党员，‘吃知识分子’”的严重错误。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而是把他们看作同资产阶级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僧侣一样的非劳动者；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一支社会力量，而是把他们看作不革命或阻碍革命的力量，甚至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也完全归罪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在这一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左”倾理论和政策在共产党内处于统治地位，不仅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也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历来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左”倾错误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

早在1924年10月，周恩来通过对广州政治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这里，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完全同归一个范畴，他们都既是革命左派，又是劳动者阶层。1928年11月，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在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发布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中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许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放着小资产阶级意识不反对，“专

---

《六大以来》（上）第3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186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42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六大以来》下册，第55页。

《六大以前》第202页。

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这就是说，绝不能因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中有人对革命发生动摇，或有人背叛革命，而得出整个知识分子都不革命的错误结论。以个别代替一般，把特殊与普遍等同，以局部掩盖整体的认识问题的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1949年4月，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在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sup>1</sup>明确肯定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劳动者。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他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又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成线。

精神劳动者就是劳动者，周恩来正是从这一决定其阶级属性的关键点出发，才非常明确的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本来是一个正确而又深刻的科学观点，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存在着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认为知识分子是属于非劳动者阶层，是“改造对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最没有知识的“消费者”。因而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左”的错误，别有用心地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对象”。这就把广大知识分子从劳动者范畴内推向非劳动者范畴，并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坚持、充实和发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思想 1950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劳动创造世界，科学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就是说，任何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体、统一过程，既没有离开一定体力劳动的纯粹的脑力劳动，也没有离开一定脑力劳动的纯粹的体力劳动。农民种田，工人使用机器生产产品，虽然他们的生产过程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但又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虽然他们的劳动过程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但又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和农民叫劳动者，而把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叫“非劳动者”，称作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最没有知识的“消费者”，显然是不公道的。所以，应当承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共同创造世界，共同创造社会财富这一完全符合历史的普通道理。

在此之后，周恩来把关于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思想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了科学的阐述。1956年2月，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

---

<sup>1</sup>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页，第327—32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9—350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页。

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1962年8月初，他在向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中，以及在同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从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来考察，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周恩来为了论证这一思想，还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周恩来还进一步强调说，对我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估计，“要以这个为纲”。有力地批判了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以及后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知识越多越反动”，是“革命对象”等反动观点。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些重要文献在民主革命时期，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在《告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布告中，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工农红军。“红军政治部正需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作政治工作。”1933年，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说明，不剥削他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同一切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劳动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把当教员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可见，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认定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并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依靠力量。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同职员一样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8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7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六大以来》（上），第445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104页。中共中央党校编。

的大会上强调说，我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知识分子实际状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依靠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着重号是作者加注）列宁说：“知识分子……，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科学论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地位的真实情况。

总之，无论说知识分子是“精神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者如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雇佣劳动者”、“寄人篱下的雇佣者”等，共同的特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劳动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群众是创造世界和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既是改造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又是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他同工人、农民等一切劳动者一起共同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公认。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3 页。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77—178 页。

### （三）革命需要知识分子

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这是周恩来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

中国近代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指导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但中国人民并没有什么可抗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思想武器。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档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真理，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政党，举行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从血的历史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出路何在呢？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这里看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希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从十月革命中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工人运动胜利的保证，“可贵可重”，劳动阶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经为典”。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知识分子是“最易于接受真理”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首先觉悟的成份。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先觉悟、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不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当时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开始。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了帝国主义必然要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无限向往的坚定信心。他认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 页，第 1476 页。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 2 期，1922 年 8 月 16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5 页，第 1476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8 页。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泽东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就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积极的组织革命团体和宣传革命思想。1918年4月，毛泽东创办了“新民学会”，它是“五四”前后湖南革命的核心组织。同年九月，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积极发动和领导了湖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进行了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斗争中，毛泽东用了极大的精力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研究革命实践中的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指导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为救国救民寻找真理。1910——1913年，他在沈阳东关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明确目的。1913年进入南开中学之后，为了挽救“积弱不振”、“外侮日逼”的祖国，他组织进步团体，“研究各种学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六岁的周恩来，目击中国的黑暗现状，痛心疾首于军阀的连年混战，他在《敬业》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春日偶成》的五言绝句一首，抒发改造黑暗时局的伟大胸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他主编《校风》，在发刊词中说：“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之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象毛泽东青年时代写《沁园春》，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忧时爱国的心声一样，反映了当时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愿将热血奉献祖国的情怀。

1917年，周恩来怀着救国济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新思潮的急切愿望，东渡日本，寻找革命真理，探索前进道路。留日期间，正是十月革命巨大影响传到日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流传的时刻。他特别喜欢阅读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对“新思潮尤所切望”的周恩来，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恰似在浓云密雾中，看到了“光明”，“一线阳光穿出，愈见娇妍”，压抑不住无限喜悦和振奋的心情，誓要为马克思主义的“光明”——照遍全球而努力奋斗。他断然决定弃学回国，随即投身到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之中，在敌人黑暗的牢狱里，勇敢地燃起马克思主义的光明火炬，向同狱的战友们演讲“马克思传记”、“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资本论”等等。这充分表现了周恩来为宣传真理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表明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四运动，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长壮大、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带来巨大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的形势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最先从北京的学生运动开始。由于卖国政府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愤怒。从上海开始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全国许多工商业者也举行了罢市。这样，以中国革命知

---

《周总理青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卷，第12页。

转引自《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第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周总理青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卷，第140页，第142页。

识分子、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五四运动，就突破了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而发展成为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是最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阶级队伍进行革命的活动中，起了桥梁和先锋的作用；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

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兴起，使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结合的必要性，使他们决心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列宁说：“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民运动，有哪一个阶级运动不是从无组织的自发活动开始的，不是在本阶级知识分子的自觉帮助下，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政党的？”知识分子“能够给小生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从思想建设方面来看，在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展开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团和刊物，象雨后春笋似地不断增多。在北京，1919年7月出版了李大钊任编辑主任的《少年中国》杂志，11月出版了瞿秋白主编的《新社会》。在湖南，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在上海，1919年6月，创办《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天津，周恩来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在四川，有《星期日》。在浙江，有《教育潮》。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共达二百多种。

从组织和干部方面来看。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一些地方，以及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相继建立了同样的组织。各地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周恩来在1920年11月，远涉重洋，赴欧勤工俭学。他在巴黎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并同赵世炎、陈延年等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周恩来非常重视思想建设和注意培养干部。他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要“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他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起草的团章的第一条规定：申请人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他指出：“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的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骨‘学’，‘学共产主义’”；“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他认真组织大家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为了共产花开，为了赤色的旗儿飞扬而甘愿把

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革命的事业。

周恩来重视培养干部。旅欧的共产党组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

---

《列宁全集》第4卷，第254页。

《列宁全集》第9卷，第200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54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如建党时期的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坚白、肖扑生、向警予、熊雄、孙炳文等等。他们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军队和新中国，在艰苦的斗争中先后英勇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很多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的，如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维汉、何长工、蔡畅、李富春等。他们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见，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同革命知识分子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不但创始人全是知识分子，而且整个党也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列宁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中国无产阶级也不能例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中国历史上无产阶级的最早的最有知识、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代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十二人，党员共有五十七人，“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鉴于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才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有党员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党员只有一百六十名，知识分子党员二百六十名，仍然占多数。在建党的初期，这完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正常现象。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政党”。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否认或者“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知识水平较低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为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已经表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发展和成败。大革命时期，革命迅速向前发展，这同中国共产党发动大批知识分子开展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密切相关。“三大”以后，共产党的决议已较多地注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中强调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才能实行国民革命。还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受新文化运动中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逢蓬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辰对军阀。”中共“四大”《对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指出，青年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指出，工农群众和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是新的革命势力、革命的基本力量，“在民族革命运动中，

---

《列宁全集》第4卷，第256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19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 、 《列宁全集》第4卷，第246页，第254页，第256—257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5页。

革命的学生真是一种重要的成份”；并作出了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学生运动决议案》，提出：“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中共的知识分子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也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了“左”的束缚，仍然制定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的正确政策。1929年，红军第四军党部在《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的布告中，号召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农革命”。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应该受到苏维埃政府的保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于1937年12月，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中，号召知识青年应该成为“抗日的支柱”，应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迎接“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1939年12月，党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知识分子采取“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的提拔”的正确政策。于是，大量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到军队、政府、学校中工作，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具备党员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非党的知识分子也得到良好的安排和任用。这就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的状况，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干部条件。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证明，“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收吸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充分肯定的。“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如果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或者阻止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可以说革命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80页，第6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6页。

《陈云文选》第14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51页。

#### (四) 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以知识造福于人类周恩来说：不仅“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而“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sup>1</sup>知识分子是以知识为手段来为人类服务的。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理论、科学等是人类社会共同劳动的产物，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最本质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高度发展的智能。人的智能把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把人们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知识，通过语言文字的手段加以概括和总结，系统化为科学的理论，并世代相传，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说：“科学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不论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而科学地认识、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则是从马克思开始的。知识分子就是以从事积累知识、概括和传播知识为职责，以知识造福于人类社会的脑力劳动者。凡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周恩来指出：“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的病虫害消灭掉；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学理的，是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知识分子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知识分子都是最先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也是“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了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知识分子富于敏感性，善于洞察社会演变的进程。正如周恩来说的，他们“最易于接受真理”，并自觉地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每一个伟大变革和进步，知识分子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一代代知识分子，是以往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从牛顿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杰出的科学家们用理论指导实践，出现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激动人心的科学时代——“原子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近代科学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物质技术手段，所创造和发展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等、不是已经日益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的强大武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吗？“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科学认识，总结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优秀成果，并把它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献给工人阶级，献给全人类。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智慧和良心受到

---

<sup>1</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页。

<sup>2</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22页。

<sup>3</sup>《列宁全集》第7卷，第30页。

<sup>4</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8页。

<sup>5</sup>《马克思恩格斯选》第3卷，第575页。

了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敬佩。

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在旧中国被压迫了多少年的知识分子同人民一道翻了身。周恩来举出一个旧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的工作遭到破坏的实例说：“李仪祉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花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举此一端，可见全貌。”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不能发展，科学家无法贡献自己的能力。科学工作者“一直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理想不能实现，计划不能实行，工作不能开展，甚至连生活也陷入困境。”<sup>①</sup>周恩来说，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和人民一道翻身了，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这就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他热忱的号召中国科学家和广大知识分子为“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的伟大目标努力奋斗。他说，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当团结，携手共同前进。“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sup>②</sup>1956年，在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之际，知识分子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周恩来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提高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不断改善。“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也就是说，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强调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需要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所以“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当时的统计数目，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等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他们对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52年到1955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少数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有二百四十多种；我国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已经达到苏联1952年的水平。在理论科学方面，我国数学、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的若干门类的成就，已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部分已经对生产的实践有了贡献。这就充分证明，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事物的主要方面，应当充分肯定。周恩来正

---

<sup>①</sup> 李仪过（1882—1938），陕西蒲城人，水利专家。1922年起，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提出很多治理黄河的意见，主办汪陕西省祈惠、洛惠、渭惠和织女渠等灌溉工程。

<sup>②</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页，第23页，第30页。

《周恩来选卷》下卷，第159—160页。

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和本质属性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中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预见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1953 年，我国正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周恩来就明确地指出：“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是一项重大的任务。1956 年，在基本完成三大改造之后，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因为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如果我们没有农业机械工程师、电站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等，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就不能实现；如果没有教师和医生，我们就不能开办学校和医院；如果没有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就不能开展文化生活活动。因此，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要求共产党的各部门、各级组织，都应当重视这个问题，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迅速增长的需要，并“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这就是共产党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为什么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和我国科学的发展呢？他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发展，“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发展，就必须把握住世界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奋起直追。周恩来在研究我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预见到了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他说：“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还有，“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但是，周恩来的上述预见，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些人虽然也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对我国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建设有影响，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为什么落后，关键的问题何在。这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时，应当吸取的一个教训。

1963 年，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在《建减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演讲中强调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由此出发，周恩来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把整个科学技术人员的队伍、知识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4—166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10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7 页，第 161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81 页。

分子队伍看作是“国家的宝贝”。周恩来的这些思想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原理的。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创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现代科学技术所经历的伟大革命也说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靠科学的力量，靠技术的力量，在生产劳动中脑力劳动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重视科学技术，重视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绝对需要的智力因素，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但是，过去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犯过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为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和做法发展到了使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周恩来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长期未能变为现实。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的思想开始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构成的。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我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这是说，任何社会劳动，都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支出。所谓体力劳动，则是指以消耗体力为主的劳动；所谓脑力劳动，则是以消耗脑力为主的劳动。一般他讲，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人们的劳动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中也包含着一定量的脑力消耗，不过它只是作为体力劳动的附属物凝固在劳动产品之中。但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脑力劳动在社会物质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长，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在物质生产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较多的劳动者比之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较少的劳动者，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已经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第4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5—36页。

《资本论》第1卷，190页。

并且，越来越要求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胡耀邦也指出：“我们的一切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共同产物。当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成果越来越显得突出，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的比重也会逐步增加。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包括体力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体力劳动中的脑力劳动因素不断增加，一批体力劳动者按照社会需要转变为脑力劳动者。”<sup>1</sup>这些科学的论述，说明了一切社会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共同产物；说明了脑力劳动在社会生产劳动者中的成分越来越多的趋势；说明了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被运用于生产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说明了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应该重视智力和人力的开发。这不仅是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和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巨大作用的预见，也是对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发达国家的脑力劳动在生产劳动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的经验表明，在机械化的初级阶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消耗的比例为9:1；在中等机械化阶段，两者的比例为6:4；而在自动化较高的阶段，两者的比例则为1:9。美国在1956年“白领”工人（从事智力劳动和管理工作）第一次超过“蓝领”职员。1980年二者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二比百分之三十四。这正是马克思早就预见到的，随着自动化体系的出现，工人不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不再作为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日本六十年代在新兴化学工业中，工人由体力作业变为监视作业的部分达百分之七十六。

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成为直接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经验表明，生产的增加越来越靠知识。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79年科技咨文中讲到：“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长有百分之三十一——四十是技术革新的成果。”还有资料说明，世界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初的生产增长中，有百分之五——二十是靠新技术取得的，到七十年代，这个比例已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八十。美国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中，计算机和通讯的作用达百分之十五。日本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企业，由于采用了微电子技术，生产效率普遍提高了百分之十一。最近四年里，日本工矿业生产的增加率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是依靠尖端科学技术取得的。据我国在1983年公布，全国有四百二十八项发明和一百二十四项自然科学成果获奖；其中有十三项科技成果在生产上推广，每年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三十亿元。山东的鲁棉一号，科技人员仅花了三百六十万元的实验费，就换来了棉花的大面积增产，创造经济效益大约三亿六千万元之多。1986年8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宣布首次荣获科技进步奖三百七十八项。其中一等奖八项，二等奖八十三项，三等奖二百七十项，学术理论奖十七项。获得一等奖的“小型材切分轧制工艺”，是近年来国外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首钢科技人员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先进完整的切分轧制工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采用这项新工艺后，两年内为国家增加利税二千六百多万元。

再从世界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开发智力和人力的经验来看。日本、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并发展成为经

---

<sup>1</sup>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30页，第12页。

济大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教育，重人才，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的作用。美国能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也靠的是人才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从国外吸收科技人才达二十二万人，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美国现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一百多万研究院毕业生。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日本 1970 年是百分之五点五，1980 年达百分之十四点四；美国 1970 年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一，1979 年占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一。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有五百九十九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只占百分之零点九。从教育经费增加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教育经费由 1950 年的八十七亿美元，上升到 1980 年的一千零八十六亿美万，增长了十一倍多，日本由 1961 年的二点一万亿日万，上升到 1980 年的十四万亿日

元，增长了近七倍。1981 年美国的全国教育和训练经费高达二千二百亿美元，科学研究经费为六百亿美元，两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点三。我国从 1953 年到 1978 年的二十六年间，国家用于科技、教育方面的投资额平均每年为八亿元，1985 年达到八十亿元。以上这些材料，都充分说明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中共“十二大”确定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 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达到这个目标靠什么呢？靠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将“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的源泉，成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的基石。”同时，“科学技术主要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品，应当充分认识和评价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最主要的“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这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发展。周恩来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已开始并必将变为现实。

---

、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 26 页。

、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光明日报》1985 年 3 月 20 日。

## （五）团结知识分子的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文化界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广大文艺工作者迫切要求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1938年初，阳翰笙积极联络文艺界人士，并与国民党文人王平陵交换意见，酝酿成立，“文协”。周恩来就“文协”的设置和人选问题，曾多次与文艺界人士商谈，并请老舍作“文协”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提出，这个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团体应“包括各方面力量”，“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周恩来当选为名誉理事。他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因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作家们多取材于前线战士的英勇奋斗，多取材于战区敌人的残暴，多取材于全民动员的热烈。只有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他希望文学家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内地，都要更多地接触人民的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学传统。”这“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要迎头赶上世界文艺，就“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光辉的地位！”周恩来的讲话，实际上成为“文协”抗战文艺的指导思想。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共同抗日。这就需要团结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舆论，来孤立投降派和反共分子。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非常重视团结文化知识界的工作，他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1939年8月，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提出，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国共关系应该充分注意，但在同时也应努力开展国共两党关系以外的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要“积极扶植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用极大努力，动员和说服那些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和同情我党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积极地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在这里，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认清，……发动大批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即组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下册），第249页。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8日《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

《言犹在耳记忆仍新一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5年1月8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页。

《六大以来》（上）第1075页。

织工农劳动群众与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也必须吸收大批的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使之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各级党部必须懂得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要性。”中共中央的指示，肯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提议，肯定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恩来亲自负责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工作，领导文委在新闻界、文艺、教育、科学技术界争取文化人及知识分子，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发展进步文化运动。

1940年，国民党宣布取消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于1940年10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国民党限制“文工会”的活动，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把“文工会”变成为掩护、团结进步人士、开展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生活的据点。使文化工作委员会冲破国民党提出的“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无理限制，召开了各种专题的演讲会、纪念会，把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团结起来。1941年是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提议并安排为郭沫若举行纪念会，把它当作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在纪念鲁迅时，周恩来强调文艺界不屈的斗争精神，鼓励大家“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用咀及笔来一齐打敌人！”在纪念孙中山时，强调联苏联共，坚持抗战。“文工会”利用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进行长期斗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基地。国民党称它是“租界”，群众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赞扬郭沫若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这“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这也就是对文工会的肯定。皖南事变以后，一方面，周恩来对文化界的民主运动更加支持。他说：“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老舍、柳亚子、徐悲鸿、冯雪峰等三百多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对时局进言》，提出要求实行民主、自由的六项具体意见。这是文化界民主运动的一次重要行动。另一方面，周恩来认真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对大后方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说服文化界友人离渝，并为他们筹备路费、安排去处。经中共南方局文委疏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有百余人。周恩来说，这批人中有的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到外县”。“到上海或香港，除毫无社会关系不能移动者外，尽量离渝。”结果保护了茅盾、邹韬奋、沙千里、沈志远、张铁生、千家驹等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使之能继续坚持工作。其中还有一部分去了延安。

---

《六大以来》上册，第1074—1075页。

《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0日，《他—活在我们心里》。

《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8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15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周恩来十分关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安全和生活疾苦。1946年6、7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给吴玉章、王维舟、何其芳的电报中说：“倘时局再恶化，应设法安顿文化界朋友”。“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剧作家洪深因政治上和事业上无出路，家庭经济困难，全家服毒自杀。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急救，脱险后又资助洪深一家到桂林治疗休养。作家王鲁彦因贫病交迫，在桂林逝世，周恩来请冯雪峰寄送抚恤费。马寅初教授，因反对蒋介石被逮捕入狱。获释后他继续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宣传自己的战时财政经济主张。但在国民党当局的威胁下，一般报刊都不刊登他的文章，处境非常困难。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新华日报》登他的文章，并给于极高的稿酬。周恩来通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扩大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团结教育界、科技界的进步力量周恩来历来重视做学校青年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学校的学生工作的根本任务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周恩来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曾多次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参观访问，出席校友座谈会；到重庆市重属联合中学演讲，给学生题词；关心和支持蜀都中学、和育才中学的创建。他还特地从延安派人来担任育才中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选派一些知识渊博的中共党员和动员一些著名的进步学者、教授、艺术家、文学家到该校任教，并从经济上给予资助。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育才中学和蜀都中学始终不渝地沿着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转送青年干部的基地和革命据点之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同重庆市的十多所大学，如重大、中大、交大、美院、教育学院等学校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师生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不但使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在学校中保存下来，还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44年底，周恩来利用国民党发动的“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工厂和农村去为人民服务。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周恩来这种“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的细致的工作，使统一战线深入到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

周恩来很重视作教授、科技工作者的团结、统战工作。他团结和组织了重庆大学教授谢立惠、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寂、金善宝、干译、涂长望等二十余人，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团结他们为抗战服务。《新华日报》开辟了《自然科学》副刊，请参加座谈会的人负责编辑。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自然科学》副刊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之外，还宣传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超越政治，批判了“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观点，主张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而奋斗。周恩来还亲自做著名科学家的工作，动员他们组织范围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得到了著名科学家竺柯桢、李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15—116页。

《六大以来》下册，第740页。

《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11页。

四光、任鸿隽、丁 林、严济慈及其他科学工作者一百多人的热情支持。经过筹备， 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科协”把广大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投身于爱国抗日民主运动。同时，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和从事民主运动的大学教授许德珩、税西恒等共同发起组织“民主科学社”，以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为奋斗目标。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是科技界影响较大的政治性团体。

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新闻界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整个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是一支人民的号角，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徽，一面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现在（指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笔者注）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标徽……。”周恩来一贯要求《新华日报》既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发展报纸工作，又要通过报纸来宣传、加强统一战线。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多”，同他们“结交朋友”，“和同盟者一道干，”    才能有效地冲破新闻封锁和种种压制，做好报纸工作，联合新闻界的进步力量，成为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一个方面军。

建国后周恩来回结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逊谨慎的精神，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团结、保护知识分子，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理论一直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称赞。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9月29日）一文中，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转移到人民立场上，更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前进；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一文中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相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在《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8月2日）一文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者阶层，批评了1957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上述这些重要文章，反映了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代表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郭沫若呼吁说：“一切从事科学、工程、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应当无愧于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称号，无愧于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自己一切有用的知识，无保留地不吝惜地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正确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接受、掌握，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不仅大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且密切了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巩固了统一战线。

周恩来认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他认为，不仅国内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留居国外愿意回国参加建设的知识分子，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应当争取。我国科学文化界

---

、 《新华日报的回忆》集续，第451、460页。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9—71页，第158—189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369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第5页，1956年2月，人民出版社。

有许多知名人士和骨干力量，就是在周恩来的安排帮助下，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种种阻碍，陆续回国的。1955 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时，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过问，钱学森才能得以回国。周恩来曾经这样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

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是值得的。这说明，周恩来是怎样看重留居国外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黑云翻滚，国家动乱，周恩来处境困难，仍然心怀革命，心怀知识分子。1966 年 8 月，他在《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列有郭沫若、章士钊、沙千里等人。1970 年 8 月，他在《应给华罗庚以保护》的文件中指出：要“防止坏人害他。”“文化大革命”初，在把钱三强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时，周恩来十分明确他说：

“钱三强没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2 年夏，钱三强在陕西合阳干校患病时，周恩来得知后及时指示，让钱三强“回到北京进行治疗。”1975 年 11 月，我国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靠边站”时，是周恩来亲自点名请她出来工作的。

林巧稚深情他说：“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的信任和爱护啊！”

“他对知识分子，总是处处充满了希望。我将永远记着他的希望，象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50、455 页。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三），第 100 页。

同 第 256、257 页。

## （六）善于团结知识分子

周恩来提倡广交朋友周恩来认为，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司令部，但要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_\_怎样才能解决好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呢？他指出：“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_\_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扩大统一战线，就必须要求自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周恩来在解决党与非党合作，扩大统一战线这一重要问题上，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有许多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广交朋友的事例。如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他始终不渝地耐心细致地做争取团结的工作。1936年在《致张伯苓信》中说：“不亲先生教益，垂甘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周恩来接着把他的革命活动归功于“师训”：“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在进一步提出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统一对外——抗日的主张时，也殷切希望：“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南方局工作时，每年南开中学的校庆日（即四月一日），周恩来总是以老校友的资格去庆祝，并以老同学的名义发言。他既讲鼓舞人心的政治形势，又鼓励同学努力学习，成为国家建设人才。他风趣地谈到他是被老校长开除的学生，他来学校既是来庆祝的，又是来补课的：同老校长谈笑风生，非常融洽。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周恩来还善于同过去反对过共产党和他本人的人，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合作，同他们交朋友。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团结群众和结交朋友中，“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例如，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一个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张冲。虽然，1932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伍豪事件”，就是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主谋的，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冲主张国共合作，并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周恩来交往了二、三百次，“由公谊而增友谊”，“绝未以一时（两党关系）恶化，疏其关系。”1939年春，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工作时，也得到了张冲的帮助。1940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

---

、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9页、第326、327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8、330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

《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第9页。

《新华日报》1941年11月9日。

共事件时，周恩来给张冲写信：“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抗日的反共活动”，“请兄以弟意转呈委座”。1941年11月，张冲去世，周恩来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悼词。《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此事在国民党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

周恩来不仅身体力行地广交朋友，发展统一战线，还把交友作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列为工作任务。1942年，在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的基础上，在执行“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二是开发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两者不可偏废，而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的地位”的青年工作方针时，周恩来还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任务，要求共产党员都要广交朋友。隐蔽方针、青年工作方针和“三勤”任务的贯彻执行，对于共产党团结知识分子，发展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民主运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主张平等待人周恩来一贯认为，共产党或是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更应当加以注意。他说：共产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内各部门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又说：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呢？党章既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任何一个党员干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党员以领导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共产党人‘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着重号是作者加注），才不是官僚主义。’周恩来就是始终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分子，知识分子中的一员。1951年，他在对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讲话时，就是以自己作实例的。他说：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点体会。我‘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毫不掩饰他讲了自己在工作中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他的讲话没有那种以“改造”者自居、指手划脚、盛气凌人的架式，而是平等待人，促膝谈心。周恩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坦白胸怀和平等待人的品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衡量共产党员或领导干部是否平等待人的标志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和群众是不是处在同等地位说话。周恩来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或是在学术问题上，都反对把领导人的讲话一概当作指示。他说：“党员个人的讲话有些时候是根据党的指示，传达党的意见。但是，人总是有个性的，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兴趣大一些，因此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在某一方面多讲一些，发挥一些，这是有可能的。领导者的讲话也有不是指示性的，如果一讲话就是指示，那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8页。

《新华日报》1941年11月9日。

《六大以来》（下册）第745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页，第60页。

么这日子如何过？所以我总是不大赞成讲‘指示’。”他多次讲过，他也从不把自己的讲话当作绝对正确的“指示”，硬要别人接受或者坚决“照办”。至于在学术研究问题上，周恩来更是抱着商量研究的态度。他说：“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王昆仑是我国文学界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写过一本《红楼梦人物论》，头一篇“晴受之死”发表在当时的《现代妇女》杂志上。周恩来看后很高兴地给予肯定。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评论，表示赞同作者的观点。解放后，周恩来很关心王昆仑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63年，王昆仑同女儿王金陵合写了昆剧《晴雯》，演出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去看了。周恩来让王昆仑和女儿坐在自己的身旁，边看边提意见，演出结束后又专门谈了一次。他肯定了这个戏写晴雯是反抗的奴隶这一主题，同时又指出在表现上还有缺点，对如何修改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但最后，他特别说：“我讲的都是个人意见，你们也可以不接受。作为古典戏，也可以照现在样子演。”周恩来这种平等待人的谦虚美德和民主作风，至今还使他们父女、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感动，称赞“周恩来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敬佩的领导人。

政治上引导，生活上照顾广交朋友，团结知识分子，处理好共产党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为了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在朋友的交往中，不可能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不同能没有矛盾。周恩来指出：“党派有排他性，这在对敌斗争上是绝对必要的，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是，排他性是不能随使用在各党派合作上面的。“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它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排他，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是要使联合性与排他结合起来，运用得当，不然的话，便会破坏统一战线。”周恩来还强调说：“共产党在政权中，在人民团体中，必须贯彻同样的原则，才能同党外人士团结得好，才能带领这个队伍完成好各项任务。”问题的界限是很清楚的。对于朋友中出的差错、问题，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热情地推动朋友们进步；而反对粗暴，反对伤害朋友。1941年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国民党CC派通过某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有几位救国会领袖一时不审，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和董必武及时约请这几位朋友交换意见，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日。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是有不得已之处，不能因此损坏中苏关系。几位朋友认识到了这个声明的问题。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就特别注意大局，注意与中共配合。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召开伪“国大”，企图诱逼民主建国会参加。民主建国会接受了周恩来的帮助，认识到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决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无法调和。因而，民主建国会公开声明，决不参加伪“国大”。后来，还决定派章乃器、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5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5页。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3页。

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仍然用很大的精力帮助、引导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进步，从理论、方针政策上给广大知识分子指出了不断前进的正确方向。同时，无微不至的关心知识分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周恩来说：要“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要“以诚心诚意去帮助他们。”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从旧社会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任妇产科医生，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成为中国少有的女医学专家。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影响，她信仰上帝。但是，林巧稚更信任周恩来，同周恩来很熟悉，曾多次到周恩来家作客。这是因为周恩来首先信任林巧稚。周恩来认为，团结知识分子，一定要以信任知识分子为基础，“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有了相互信任的这个基础，帮助知识分子进步，也还要有一个恰当的方法，不能以“帮助者”自居。“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sup>1</sup>所以，林巧稚回顾说：“周总理比我年长三岁。他是一位严师，又象是一位兄长。他是一个举国敬仰的人，也是一个风趣的人。他对知识分子，总是处处充满了希望。”<sup>2</sup>

---

<sup>1</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6 页。

<sup>2</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6 页，第 368 页。

## （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历史必由之路

周恩来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周恩来历来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1924年10月，周恩来通过对广州政象的观察和分析，指出，国民党右派是不革命的，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相结合，革命才有可能胜利。1928年11月，周恩来在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发布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批评了破坏工学结合的“左”烦错误。他指出，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反对知识分子，是十分错误的。这就“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使我国处在一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周恩来号召青年、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抗战，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支柱”。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题的演说中指出：青年应当“到军队里去”，充实我们的队伍，责任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青年应当“到战地服务去”，把战地的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他们去打击敌人，做到军民合作；青年应当“到乡村中去”，动员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青年应当“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把被压迫的同胞武装起来。他要求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去发扬自己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去把知识活用”，“那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新中国建立的前夕，1949年7月，他《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要进入到部队，进入到农村，进入到工厂去，“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周恩来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基本思想。周恩来还批判了共产党内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一问题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他说：“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能使革命取胜。”而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如象广州起义和上海起义，只把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结果广州起义和上海起义都失败了。“‘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着重指出，现在到了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应该充分认识到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起义只有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和知识分子相结合“才能有力量。”

知识分子与工农在革命问题上的结合历史证明，在革命时期，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就是经过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的结合来实现的。因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

---

《六大以前》第202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9—91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4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产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是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渊博的知识，需要用较长的时间从事巨大的科学探究，才能创立起来。而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也当然只能首先被知识分子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农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条件，既不可能具备创立科学理论的条件，也不具备直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这种条件。所以，工农阶级要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经过革命的知识分子作媒介，由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运动中去。一旦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不断结合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并指导“五四”运动，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也使自己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批又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不断地参加共产党，其中许多入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不断同工人运动结合，同农民运动结合，发展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总之，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大批知识分子不断加入革命和工农相结合，不断地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是有曲折和反复。

“八·七”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由于一度片面强调工人成份，在干部中搞大换班，排斥知识分子，正如周恩来所说：“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左，多倾关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王明、张国涛等都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破坏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削弱了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力量。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纠正了“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使大批的知识分子更加踊跃地参加革命队伍，大批知识分子更加深入地与工农相结合，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知识分子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出：对于知识分子，要“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最深刻的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这将涉及到“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页。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页，第174页。

子问题”。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要求全国各阶层的人民，从工人、农民到大学教授，甚至是老年人，也都要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中国，观察事物，观察自己，认识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认识劳动的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而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也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正确地总结了我国知识分子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不失时机地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揭示了我国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上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规律，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51年9日，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学习和工作，“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他恳切地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观察一切事物、处理一切事情。当然，“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周恩来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最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主义的民族观念。这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由于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觉醒了，十月革命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这就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所以，要求民族解放，就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没有人民的立场，而只有一般的笼统的民族观念，是不能真正达到爱国、爱民族这一目的的。知识分子有了人民的立场，还要继续前进，“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整个民族的：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进入无产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为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因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这是其他别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才能完成。所以，历史必然要求知识分子由人民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同工人阶级一道承担和完成解放全人类的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要完成这个由民族立场进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的发展过程，就必须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说：要使知识分子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 and 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要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明确地懂得理论，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74 页。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1 页，第 62 页。

、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2—63 页，第 64 页，第 65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7 页。

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周恩来还以自己为例，说明通过实践，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

周恩来对我国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变化过程的科学总结，既符合我国知识分子整体变化的状况，也符合知识分子个人变化的状况。旧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不能眼看着伟大的祖国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蹂躏；他们是为了振兴中华，才奋起改革和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不忍祖国被列强“瓜分豆剖”，为改变祖国的“兵弱财穷”，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愤激于列强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主要是爱国主义推动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在反对在巴黎和会签字、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是在爱国主义思想上起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从爱国到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政治上的共同发展趋势，可说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对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道路，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动时期更为重要今天，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在革命问题上的结合。现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在经济建设上，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结合。如果说过去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对革命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那么，今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进而使干部和工农知识化、专业化，对于四化建设的成功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质、目的，在于能使知识、科学运用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实行了改革，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出现了各种专业户。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已认识到科学地发展生产、知识、信息、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千方百计地聘请各种科技人才，帮助他们致富。邓小平同志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自的实践中，懂得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穷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农民的发明。但是，他们的意思，同我在科学大会上讲的话是一样的”。可以预见，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在工厂和工人中会出现更加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信息、知识分子的新局面。新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大结合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趋势，必将推动和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对我国“七五”计划的完成，在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的奋斗目标和四个现代化的成功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正如胡耀邦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工人、农民更好地结合起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干，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才能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真正转化为造福人民的巨大力量。”

---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0页，1962年版。

《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光明日报》1985年3月8日。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14页。

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求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工农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或阶段，而要求干部和工农知识化、专业化，则是这一过程继续向前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或阶梯。只有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地结合发展，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才有希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才能成功；建立在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显示他无比的优越性，取得更大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只片面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而看不到或忽视干部工农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这个方面，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要求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已经讲过。周恩来也很注意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党必须培养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周恩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向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提出了两个“必须”：一是必须精通科学和文化知识；二是必须学会领导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本领。但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引起大批干部的注意，并且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上出现过两种不良的倾向。第一种是以天然的领导者自居，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天经地义，出现大批只“红”不专的空头政治家；第二种是以为“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结果是大犯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忽视科学文化事业的错误。更无须说十年动乱中掀起的白卷“英雄”的黑风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比之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工农要知识化的问题更为迫切和重要。所以，胡耀邦强调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问题”，“是一项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蓬勃发展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措施。”，（着重号是作者加注）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88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88 页。

《知识分子文献选编》第 18 页。

## （八）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改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周恩来说：“科学他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因此，改造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改造任务；一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人类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和以后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类由自发进入自觉的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历史阶段，所以提出“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sup>1</sup>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承担起认识和改造整个社会、世界的责任，并揭示社会未来发展的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私有制度，完成了改造、变革社会制度的伟大任务。但是，并非改造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在社会改造中，还包括人的主观改造问题。所以周恩来又说：“一个人，一个社会，都要不断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肩负着改造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任务，而且承担着改造人的任务。在社会主义的初期，还存在着各种阶级，对不同阶级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改造。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的改造，要采取专政的方法。“在他们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迫使他们逐步改造成为新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要采取说服教育、民主的方法。在实行社会主义以前，对民族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教育，“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促使他们通过工作、劳动和学习，实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逐步向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转化。

对其他劳动阶级的改造，则要采取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式。首先，周恩来指出：“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人无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任何人都需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其次，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说：“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民主的改造方式。”又说：

“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对农民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逐步引导他们由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使他们克服经济上的分散性和自发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是指他的分散性和自

---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页，第327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53页，第39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第14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9页。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9页，第206—207页，第360页。

发性而言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sup>1</sup>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由此可见，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对不同对象所改造的具体内容则是各不相同的。周恩来说，“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我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解放以前还是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都把他们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是脑力劳动者。但他们从旧社会脱胎而来，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就需要改造。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的把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范畴，并且混淆了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改造方法。“文化大革命”中其恶性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周恩来的这一正确思想遭到严重破坏。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成绩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提出“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对知识分子要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呢？他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这种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造、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参加各种国际活动。事实证明，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是从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的。“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知识分子从事的业务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通过业务实践，能够更加信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自我改造以适应发展的重要性。“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科学世界观，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个方面都受了影响性。”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非常强调自觉性。他说：“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重自觉，是周恩来帮助知识分子改造的特点之一。教育界有一大知识分子张伯苓，科学界有一大知识分子翁文灏，代表性都很强。由于他们在旧中国的社会地位很高，受旧的影响又极深，思想转变自然很不容易。周恩来本着重自觉的原则，从不要求他们写什么材料和检讨之类的东西。“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

---

<sup>1</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8 页。

<sup>2</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74 页。

<sup>3</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76 页。

<sup>4</sup>《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8 页。

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贵。”“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到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的写。”在帮助知识分子的改造时周恩来首先对自己的改造严格要求，总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亲切感人。他说：他“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的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认真检查起来，还差得很远。……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冷静的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以身作则，启发自觉，决不勉强，这是周恩来帮助知识分子改造的又一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经济上和阶级关系上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执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少奇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泽东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知识分子的数量和构成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解放以后，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我国现有的二千多万知识分子的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周恩来指出：“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整体上来讲，“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历史条件下，已在全国范围内和整体规模上变为现实。尽管历史有曲折，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提出和发展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中共中央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政策，使知识分子真正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依靠力量。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长期的周恩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要求所有的人们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力量。改造客观世界没有止境，改造主观世界也没有止境，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9—70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1—62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1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2—163 页，第 36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87 页。

级的一部分，也应该坚持长期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周恩来深刻地指出：“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又说：“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象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着重号是作者加注）1957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地指出思想改造的长期性。他说：“尽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胜利，但是思想意识的改造毕竟是长期的事。”又说：我们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思想就要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揭示了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的一般规律。它说明：第一，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旧社会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就是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也不可能绝对避免受旧东西的影响。知识分子不能例外，就是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周恩来说：“毛主席说过，他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我在南开受的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好处不要抹煞。但是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教育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看不到不好的一面，不进行自我改造，就会阻碍我们进步。”我国现在知识分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他说：“从思想意识看，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的思想意识要它一下子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以为到了新社会，人们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斩断，而要长期进行。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

第二，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周恩来说：“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期，放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当很好学习，努力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知识分子只有不断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断提高自己，才能担负和完成发展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使命。第三，思想改造的长期性，不仅是指对非无产阶级或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要改造，而且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也要改造。后一种改造更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周恩来说：“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又说：“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以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一切人，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要靠自觉，要通过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要耐心细致，要讲道

---

《周恩来选引》第266—267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60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61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8页，第423页。

理和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任何简单粗暴，行政命令式的方法都是有害无益的。周恩来在谈到知识分子只有经过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练的实践，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时，指出：“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贵的，最有用处。”知识分子要到实践中去，要同工农更好的相结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真正转化为造福人民的巨大力量。所以，“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

---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67—68 页，第 368 页。

### 三、周恩来论民族问题

周恩来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既是这些政策的精辟阐释者，又是政策实施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问题方面的著作，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计有《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等，其中《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是1957年周恩来根据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这些著作是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对于我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概况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除中原之地的华夏族外，东方有东夷，东北有肃慎、胡，西方有氏、羌、戎，南方有蛮、越、濮，北方有北狄等民族。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各民族更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但各族劳动人民长期友好相处，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推动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把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曾经爆发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共同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来，截至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为止，我国除汉族外，已被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五十五个。汉族的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共约六千七百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七。

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只有一个，即壮族。人口在一千万以下，一百万以上的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等十四个民族。人口在一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有哈萨克、傣、黎、傈僳、珞巴、卡瓦、舍、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土等十三个民族。人口在十万以下、万人以上的有景颇、柯尔克孜、达斡尔、佤、羌、布朗、门巴、撒拉、毛难、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鄂温克、崩龙、基诺等十八个民族。人口在万人以下的有乌孜别克、俄罗斯、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等九个民族，其中赫哲族人口最少，只有一千多人。此外，尚有一部分人的民族成分还未确定，如 人、夏尔巴人等。

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主要分布于我国北部、西部、西南和中南部。我国二万一千多公里的陆地边防线上，大多居住着少数民族。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这里有天然牧场，原始森林、亚热带作物、名贵药材、多种多样的地下宝藏和经济作物等等，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主要的物质基础，对发展国民经济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的民族很多。其中汉族的人口最多，约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他民族只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大，大概占我国领土的百分之六十。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

## （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和根本政策。周恩来坚持不渝地倡导和贯彻这一政策。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民族平等，是一切民族的平等，从一个国家来说，要求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世界范围来说，要求全世界所有民族一律平等。这种平等要求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即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等各方面都有平等权利，一方面要禁止任何民族享有特权，另一方面要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并帮助其实现。

马克思主义把民族平等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阶级（首先是剥削阶级）消灭了也就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这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要求原先处于压迫或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采取各种措施，照顾、帮助、直至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去保证和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列宁说：“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于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这种平等观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坚持民族平等，是因为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者，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民族平等是保证实现民族团结的前提，如果民族之间不平等，就达不到民族团结的目的。所以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没有各民族的平等、解放，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周恩来的民族工作剥削制度是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要实现民族平等，必须首先推翻剥削制度。解放前，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制度，不承认少数民族，使广大少数民族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坚持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承认民族自决”。在红军长征时期颁布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七条规定：“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sup>1</sup>这些规定在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和各解放区都得到贯彻执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创建时期，民族工作处于初创阶段。周恩来作为我国总理，日理万机。在他的关怀和主持下，先后组织了中央、

---

<sup>1</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sup>2</sup>《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页。

<sup>3</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考资料》第80页，第82页。

中南、西南、西北、东北五个民族访问团，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对全国少数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每次访问团下去前，周恩来都亲自讲话作指示。同时，让各地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和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这些代表在京期间，差不多都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些活动对沟通民族感情，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强各民族大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打开了民族工作的局面。同时，建国初期，在周恩来的领导和督导下，政务院还先后讨论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等等。这些文件的颁布实施，都在各民族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为消除民族压迫制度遗留的后果，建立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结团的行为。”我国历届《宪法》均明确规定各民族平等的权利。为了使少数民族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国家事务管理，保证他们在各级政权中享有平等权利，中共中央和国家还对少数民族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作了特殊照顾，使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当家作主。据统计，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其代表占全国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原则下，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以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等一系列的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民族关系大为改善，民族团结大大加强，民族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同周恩来对我国民族工作的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民族工作的曲折和民族政策的重新落实 1958年以后，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左”倾错误，主要是忽视和否认少数民族的特点，不执行或抵制既定的民族政策：长期坚持“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民族团结遭到空前破坏。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甚至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以致民族关系出现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重申和逐步落实，民族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共“十二大”以后，民族工作更加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民族团结充分加强，这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民族问题，存在着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旧社会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影响和不信任心理，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多年来“左”

---

扬静仁《周恩来在民族工作上的丰功伟绩》、《人民政协报》1986年1月15日。

江平《周恩来对民族工作的关怀》、《人民政协报》1986年2月4日。

的思想影响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某些地方还存在不尊重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不信任甚至歧视少数民族和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的现象，在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还存在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因此，在大好形势下，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缅怀周恩来处理民族问题的光辉业绩。学习周恩来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提高我们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以利于搞好我国的四化建设。

周恩来的民族团结思想周恩来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当然，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受欺侮，必须把社会主义祖国真正建设强大了才有保证。”“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能单独发展。”

为了祖国的伟大建设，我们必须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就指出：“现在，我国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一定要彻底实现民族平等。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汉族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汉族应该多多地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只有汉族主动地替少数民族着想，才能够团结好少数民族。”

汉族应如何主动替少数民族着想呢？周恩来认为“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讲还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他说：“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就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汉族如果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就应该向少数民族赔不是。”“我们不仅这样说，还要在实际上这样做，帮助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发展。就是这样，他们的发展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汉族不去帮助，就合不好，……为了合得好，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只有彻底实现民族平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这是我国四化建设的要求。首先，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的侵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要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没有少数民族参加是不行的，没有广大汉族通力合作，同样是不行的。我国的大陆边防线有两万一千多公里，与十二个国家为邻，而绝大多数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日夜守卫着祖国的大门。他们在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守卫祖国的门户，内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就不会得到安宁：反之，内地汉族群众如果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边疆，祖国的门户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坚固，边疆的建设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面貌。其次，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顺利完成四化大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地大、物博都在他们那里（即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67—368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36—337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41 页。

少数民族地区——引者)。……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都要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结合起来。可见，合则双利，分则两害。”这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中华腾飞，就必须把汉族地区的人力、物力、先进技术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我们还必须看到，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有无比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勤劳、聪明，对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起着重大作用，并作出巨大贡献。他们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熟悉当地情况，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没有他们的积极参加和合作，将无法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

总之，“合是方向”。要团结，不要分裂，是历史的必然，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客观趋势。无论何时何地，“合作双利，分则两害”。凡是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团结合作的时候，社会就要安宁，国家就强盛；反之，各民族之间闹纠纷的时候，社会就动乱，国家就遭殃。我们要时刻牢记周恩来所阐明的这一真理。

### （三）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周恩来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了重大的贡献。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少数民族的解放和自治。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由人民统一中国”，促成少数民族“自治”的主张。不过当时的设想与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有所不同。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主张，并提出在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地方的政府中，要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以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也应有他们的位置。毛泽东提出的这些主张和设想，为中国共产党尔后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根据上述主张和设想，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1年和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都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定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基本确定并具体化了。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6年领导蒙古族，回族人民，分别在关中地区的正宁县和定边县建立了回族自治乡，在城川建立了蒙古自治区。1947年随着年蒙古地区的解放，又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在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建立的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为进一步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建国后在全国各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

建国以后，根据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统一祖国大家庭的愿望，根据以往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在《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宪法》中，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并成为我国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建国以后，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到目前为止，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先后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计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等五个自治区，三十一个自治州，八十二个自治县（旗），同时在少数民族散居杂居地区建立了二百三十三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总面积约六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总人口为一点二七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五千三百多万。从此，永远结束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9月9日。

了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无权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愿望。

周恩来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周恩来作为我国总理，协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我们国家解决了繁多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大量的民族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好。我国各族自治地方的建立，都是同周恩来的操劳分不开的。例如上述五个自治区的建立，周恩来都给予了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特别是每当民族工作出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总是亲自出面解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酝酿筹建过程中，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广西，在共产党内外，一些负责干部认识很不一致，一时很难统一。周恩来从建立这两个自治区方案的提出，到组织实施，都亲自出面做工作，耐心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最后达到认识上的一致。由于周恩来亲自过问，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这两个自治区才得以完满地建立起来。

事实证明，我党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完全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最适合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范例。然而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一些人对此很不理解，曾经提出要按照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在我国建立什么“加盟共和国”。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五七年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了最为系统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把中苏之所以不同，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两点：“这些不同，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sup>1</sup>由于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就产生了两国民族关系的差异：

第一，民族组成和相互关系不同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最大的民族是俄罗斯民族，它对中亚、西北利亚、东欧南部和东部等地区的各民族来说，是外来民族，是侵入和压迫这些地区各民族的民族，是整个沙俄时期唯一占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当沙俄发展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后，对占沙俄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七的一百多个少数民族，实行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列宁曾把沙俄指斥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并尖锐地指出：“沙俄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大俄罗斯人一概仇恨、一概不信任的阴影。”这说明在沙俄帝国，各少数民族是被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殖民地民族，大俄罗斯主义者是独霸政权的。它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我国的民族组成与相互关系则是另一种情况。构成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很早就互通有无，发生了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各民族间不仅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且还在民族内部结构上出现互相

---

扬静仁《伟大的胸怀，深厚的爱》，《民族结团》1986年第1期。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2页，第369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6页。

影响，互相同化的现象。周恩来在讲话中就以汉、回、满等民族为例，说明历史上“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的历史·事实，并指出：

“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因而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不仅有频繁的外部联系，而且还有相容的内在联系，使我国民族关系含有亲缘成分。我国有史以来就不是哪个民族独霸的一统天下，而是各族人民共存的，只不过执政时间有长短之分，参政人员有多少之别。对外来侵略或内部分裂，我国各族人民向来是同仇敌汽，协力平叛。近代，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各族人民同受压迫奴役之苦，各兄弟民族群起反抗，同求解放，共同承担牺牲，同享胜利欢乐。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我国的民族组成是祖国疆土内土生上长的各民族的外部 and 内在联系的必然结合。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共同创造祖国大业的兄弟关系，是同生共死，相互依存的关系。我国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还多，少数民族不到百分之七。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很广大，启然资源也很丰富，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这种情况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团结互助，通力合作，以求共同发展，也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应我国民族组成情况和满足各族发展要求的最好形式。第二，民族分布与居住情况不同沙俄向它相邻地区和中亚、西伯利亚以及中国侵略扩张前，俄罗斯族周围和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各自聚居的。十六世纪后，它通过侵略扩张，尽管在上述地区建立了殖民机构，实行殖民统治，但由于俄罗斯族的人口少于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特别由于各少数民族人民强烈持续的反抗，到沙皇制度灭亡为止，这些少数民族各自聚居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我国的情况却相反。由于我国各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频繁交往，迁徙住地，相互渗入，所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到解放为止，没有形成一块一个民族单一的聚居区，而是在祖国范围内大杂居、小聚居。如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再如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的蒙古族，遍及黄河以北、长城内外的祖国北部和东北、西北，杂居于半个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虽不象回族和蒙古族分布这样广，但也有类似情况。即使在小聚居区内，也不是单一民族居住，而是多民族杂居，只不过是某一民族的人口相对较多而已。新疆虽然维吾尔族人口较多，但还杂居着总人口多于维吾尔族的另外十二个世居的民族。在我国省级的行政区中，西藏是民族成分较为简单的地区之一，是单一民族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但除藏族外，仍然生活着汉族、门巴、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们杂居于藏族人民中。这种情况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于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三、民族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关系不同列宁在论述沙皇制度压迫下的各民族的自决权时曾指出：“因为他们受沙皇专制制度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未有的，沙皇专制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比较，又是最反动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70 页。

《周馥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73 页。

最野蛮的国家制度。”在沙俄殖民统治下，大俄罗斯主义者用最野蛮最反动的专制压迫，推行和维护它对各少数民族的掠夺，使它同各被压迫民族发生经济联系和经济关系。这无疑是掠夺和被掠夺、剥削和被剥削的联系和关系。另一方面，沙俄的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残酷剥削，必然激起被压迫民族强烈持续的反抗，并产生排他性，以维护本民族的经济利益。这样，除上述强迫的经济联系外，各被压迫民族同大俄罗斯主义者，就很难发生其他经济联系，当然更难有相互的经济依存关系。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关系同沙俄也很不相同。由于我国各族人民数千年交往和互通有无，还由于各族人民长期交错居住，在一起生活，自然地产生了经济上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支援，促进了共同发展。因此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局部看，各民族都形成了经济上十分密切的联系，出现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这种联系和关系，在历史上成为各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解放后，则成了全国和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条件。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各民族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乌云。但纵观我国各民族经济联系和经济关系的全貌，光明的一面还是时间长、范围广，为各族人民所拥护和赞许，因此它是本质和主流；阴暗的一面是阶段性局部性的，为各族人民所诅咒和痛心，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一面。我们应当看全局、看本质、看主流，不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由于中苏两国民族关系诸方面的不同，决定我们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周恩来指出：“历史发展给了我们各民族合作的条件。”我们在实行民族自治政策时，就不应也不能违背历史、违背现实、违背各族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如果照搬苏联的模式，就是违背历史、违背现实，人为地把各族人民分开。我们只能依据我国历史所造成的民族关系的具体实际，以及蕴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中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中苏的民族自治制度之所以不同的另一原因，是两国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

最根本的是两国当时的国家制度不同。周恩来指出：“十九世纪的沙俄”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这就是说，当时的沙俄是殖民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基于当时两国在国家制度上根本性质的不同，又造成其他具有实质性的不同：

第一，阶级结构与阶级力量不同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对内压迫其他阶级和各族人民，把俄国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对外压迫殖民地民族和人民，充当了“欧洲宪兵”。在沙俄统治下的被压迫者，不仅有农民，而且有殖民地民族和人民，还有人数较多的工人阶级，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却是以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工人阶级人数还很少，力量也很薄弱，整个国家和各民族部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境地。统治阶级对内凶狠残暴，对外卖国求荣。

---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7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5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69—370页，第374页。

第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所取势态不同沙俄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狼狈为奸，在亚洲和欧洲都采取侵略扩张政策，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争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则站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一边，反侵略反压迫，争生存求解放，这是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与奋斗目标。第三，两国共产党采取的革命路线不同两国共产党按照不同的国情，分别采取了符合各自国情的革命路线。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在城市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建立革命政权，再向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是俄罗斯的工人和士兵。在我国革命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根据我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单薄；农民阶级人数众多，受苦最重；全国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外，各阶级和各民族都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受害者；反革命力量在城市大于农村等具体实际，采取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各族农民，并组织统一战线，动员组织一切革命的阶级、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投入革命斗争。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民族、哪一部分人的功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革命阶级、革命力量、各族人民的功劳。他们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革命斗争，不仅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迎了解放，而且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这就是说：我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并肩战斗结成的友谊，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各民族的兄弟关系更加发展、增强和巩固了，造成了宜合木宜分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实行民族自治时，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实行象苏联那样的联邦制。

其实，对于国家的联邦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列宁说：“我们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因为它削弱经济联系，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合适的型式。”只是在特殊条件下、他们才把联邦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而予以肯定和采纳。正如斯大林在《反对联邦制》一文的《作者说明》中所指出的：当着马克思主义者在特殊条件下肯定联邦制的时候，仍然要加上种种“附带条件”。这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般条件下，是反对联邦制的；在特殊条件下，虽然接受它，但仍然是有条件的。

俄国革命胜利后实行联邦制有一个过程。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列宁和斯大林一直反对联邦制。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俄国各民族在二月革命后，实际上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在边疆地区成立许多小国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才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用“联邦制”的办法，把分散、分裂的俄国各民族团结统一起来。这显然是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历史和革命发展的过程，同俄国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我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国内各民族不仅没有出现过分裂，相反地团结得更紧密。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过渡”形式；包括“联邦制”的“过渡”形式，来达到集中统一。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5页。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1页。

周恩来对民族区域自治的维护周恩来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政策的系统阐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他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周恩来的科学分析和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使当时与会者豁然开朗，也使持异议者心悦诚服，澄清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这对于提高各族人民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认识及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自觉性，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推行，为组成一个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一定要尊重民族自治权利，增强法制观念。他一再指出：“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在十年动乱期间，民族政策受到破坏，民族自治权利遭到践踏。“四人帮”攻击民族区域自治是“利用民族自治，人为制造分裂”，有些人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产生怀疑；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不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削弱甚至取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周恩来每当知道这种情况，总是严肃批评这些做法，及时加以纠正，坚决维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如在“文革”中，云南省八个自治州中，有四个被合并到别的地区，使这几个州名存实亡。一次周恩来出国归来，在昆明停留期间，知道这一情况后，严厉批评了当时的云南省委领导，限定时间让他们立即纠正错误，这四个自治州才恢复过来。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加速民族立法工作，恢复和新建立了一批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1984年“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宪法规定的原则为依据，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少数民族充分行使自治权利，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迅速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自治法是对周恩来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这个法制的制定，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3—374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5页。

扬静仁《伟大的胸怀，深厚的爱》，《民族团结》1986年第1期。

#### （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面貌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以求共同解放、繁荣和发展，最后走向融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观点，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我国少数民族，长期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本民族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束缚，经济文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我国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遭到更大的摧残和破坏，处于极端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大多数少数民族还停滞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队伍，许多地方连缝衣针也不能制造：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完全靠天吃饭：交通闭塞，不要说铁路，连公路也极少，全靠肩扛背负，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许多地方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很落后，有的地方还用结绳、刻本记事，医疗卫生，更是落后，缺医少药，疾病流传的现象非常普遍。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一方面根据不同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胜利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各种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大力地全面地支援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个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水泥、化肥、纺织、机械等在内的一批工业，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初步建立起来；少数民族自己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队伍，正在成长壮大。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差，底子薄，同汉族地区比较，差距还是很大的；各民族间长期历史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还是明显地存在着。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加速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清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既是各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周恩来关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著名的讲话中，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指出：“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sup>①</sup>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sup>②</sup>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才能逐步地发展和繁荣起来。

周恩来指出，由于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不利条件，为了使各民族达到发展繁荣，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即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

---

①、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79 页，第 377 页。

解放生产力。这一伟大任务，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还严重存在。这就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只有工业化现代化了，工农业发展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般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较差，所以周恩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古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很明显，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是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国家的大力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国家的帮助必须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结合起来，否则也是达不到民族繁荣的目的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相信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和才能，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为此，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总方针。这就是坚定不移的关心、帮助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这是引导各民族发展繁荣的总方针。近几年来，我国执行了一系列符合历史要求和各族人民愿望的正确政策，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不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比汉族地区更宽、更灵活的政策，形势也是十分喜人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一场伟大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振兴中华的革命，已在全国城乡兴起，这对我们国家和各民族的繁荣富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是周恩来阐明的关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时期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理论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 （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周恩来重视干部民族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周恩来指出：“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民族化的内容，除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民族的语言文字外，就是干部方面的民族化。解放初期毛泽东也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些指示阐明了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培养民族干部的正确方向，是做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的积极的革命活动。干部则是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从事革命和建设的骨干，是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先锋，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通过干部的努力，才能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变革社会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由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事业，需要若干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为了使这种奋斗不致半途中断，这就需要不断培养和造就众多的新干部。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道路和奋斗目标。要在各民族中胜利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组织各族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便捷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各民族出身的、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忠于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各民族的干部。因为这样的干部，土生土长，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之中，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易于了解本民族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同本民族人民有血肉联系和“天然的”感情，对变革本民族地区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强烈的愿望。通过这样的干部，就能最好地动员和激发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组织和带领群众为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少数民族干部的这些特有的作用，是外来干部很难甚至无法代替的。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各民族中深深扎根和取得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贯彻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中心环节，是建设边疆，巩固国防、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靠保证。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在各个革命时期注意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亲密团结，并肩战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后，为了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共产党和国家有计划地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85 页。

毛泽东《对西北民族工作的指示》，《民族团结》1958 年第 2 期。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2 页。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提出。“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采取举办民族院校、训练班等一系列措施，有计划地造就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周恩来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我国先后成立的十所民族院校，从方案的提出到正式建成，都受到他的直接关怀。在他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述。周恩来的干部民族化思想关于什么叫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国家、行政机关干部的配备上，他强调两点。第一，在汉族人口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的地方，配备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应该略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他说：“在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必须照顾这一点。所以民族自治权利问题、民族化问题，政府机关要多注意。”<sup>①</sup>他在《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中指出：“在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应包括各方面少数民族的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可以大一些。”<sup>②</sup>第二，民族自治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是少数民族干部。周恩来指出：“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各自治区政府应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领导职务。”<sup>③</sup>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由民族干部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他们比汉族干部更懂得本民族的心理。”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必需由少数民族干部做负责工作。这样，更便于管理好本民族事务，更有效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各项事业，促进民族自治地区的繁荣和富强。周恩来在强调民族干部在民族自治地方应该做负责工作的同时，又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绝对化、片面性。他说：“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不是说由于强调在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就是所有的单位，一切部门都搞清一色。在强调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力的时候，并不是不要汉族干部的帮助，更不能借口实行民族自治而排斥汉族干部。根据需要，对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还要派有质量的汉族干部去帮助工作。同时，周恩来又指出：“在那些兄弟民族占多数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派汉族干部应该少而精，就是要派好的、得力的干部，不能多而滥。”<sup>④</sup>

他特别强调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和汉族领导干部搞好民族团结的重要。他说：“领导干部很关重要，不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都要照顾双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没有人实施。如果干部闹对立，包干、单干、歧视、分裂，则一切都搞不好。”所以，民族自治地方能否搞好民族团结，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之间能否搞好民族团结。

为了实现民族自治，达到干部民族化的要求，必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周恩来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情要靠少数民族干部，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步使他们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企业、学校中都占大多数，并且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sup>⑤</sup>这就要求必须逐步提高少

---

①、②、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5—386页，第386页，第194页，第386、194页。

④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6页。

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6页。

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6—387页，第326页。

数民族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应当多注意些”。这说明，只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从数量上不断壮大，质量上不断提高，才能担负起民族繁荣的历史重任。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阐释和经验总结，阐明了处理各民族干部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它的基本精神是长期适用的。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按照上述方针政策，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有关党委进一步重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干部一百二十多万人，占全国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这是一支相当宏大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但是这支队伍不论在数量还是素质方面，都与“四化”建设的形势很不适应。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干部不足，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少数民族的干部的补充来源比较困难，如不采取特殊措施，这种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很可能还要加大。另一个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的水平低，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占到一半，相当数量的干部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训练。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中，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条件的干部很缺，不得不降低要求。因而做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是一个更迫切，更严重的任务。周恩来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 and 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干部理论和政策。它不仅在过去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更新、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坚持周恩来阐明的关于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政策，从当前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大大推向前进，这是充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需要，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尤其是团结各民族人民胜利进行“四化”建设的需要。

#### 四、周恩来论宗教问题

周恩来是我国宗教政策主要制定者之一。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又是在周恩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和《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等重要讲话，是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决我国宗教问题的经验总结，对我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 （一）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

我国多宗教的流传和分布概况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少数民族宗教，都拥有自己的信仰者。周恩来在 1956 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这说明宗教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能否正确对待宗教，是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它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决不可等闲视之。

宗教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佛教于公元一世纪西汉年间从印度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至隋唐达于鼎盛，形成一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两宋以后，佛教逐渐衰落，但在社会生活和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仍有重要影响。佛教分北传和南传两大支，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在汉族地区流行；南传为小乘佛教、流行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与西藏原始宗教相融合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流行于藏族和蒙古族中。此外，在土家、裕固、纳西、普米、布朗、卡佯、拉祜、白、壮、布依、畲等民族中，也有佛教流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神仙方术和黄老哲学等，公元二世纪，张陵创五斗米道，张角创太平道，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魏晋南北朝时，道教经统治阶级的系统改造，形成完整的教理教义。唐宋达于鼎盛。元代分为全真、正乙两大派。至明中叶转衰，但在学术、艺术和民俗等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道教除流行于汉族地区外，在羌、苗、瑶、白、纳西、京、仡佬、毛难、黎、壮、侗等民族地区，也有传播和影响。

伊斯兰教于七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元以后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一些不同的教派，主要在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中传播，大都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与这些民族的传统习俗，道德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各大分支）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又称“景教”）于唐代传入我国。元代天主教与聂斯脱利派再度传入，但流传不广，不久中断。明末天主教再次传来，清雍正年间，俄国沙皇派东正教传教士来华。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新教各派和天主教随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大规模地传入我国，曾在历次反侵略斗争中，被视为“洋教”而受到抵制，但它在旧中国仍有一定的发展。除在汉族地区流行外，与我国的苗、彝、景颇、拉祜、卡佯、白、傈僳、怒、独龙、纳西、京、俄罗斯等民族，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影响部分群众。

上述五大宗教为神学宗教。此外，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还较普遍地流行着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自发的以崇拜自然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形式。据粗略地分类统计，我国少数民族中，信仰单一的原始宗教的有赫哲、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珞巴、独龙、基诺、哈尼、侗、水等民族；以信伽原始宗教为主、同时信仰其他宗教或部分群众信仰其他宗教的有满、朝鲜、鄂温克、羌、彝、傈僳、怒、景颇、拉祜、卡佯、白、布依、仡佬、京、土家、黎、畲、高山等民族；原始宗教与现代宗教同时信仰的有门巴、纳西、布朗、傣、阿昌、普米、崩龙、毛难、他佬等民族；以信仰一神教为主，同时仍保留原始宗教的有蒙古、裕固、哈萨克、柯尔克孜、藏、壮等民族。这是由于

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在极不平衡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保持或汲取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因而形成了形式和内容繁杂多样的宗教格局。

宗教在我国社会中的影响宗教在我国社会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又具有某些特征。由于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期居统治地位，其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宗教的发展，因而我国民众（主要是汉族群众）的宗教观念相对淡薄。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宗教采取既扶植又约束的政策，使教权从属于政权，故我国的各种宗教都未占据过“国教”的地位，除西藏、内蒙外，也未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条件各异，其宗教信仰具有一些与汉族不同的特点：

第一，信教人数多，往往是全民族信仰同一宗教。如回、维吾尔等十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和蒙古族几乎全民族信奉喇嘛教；傣族等全民族信仰小乘佛教，其他少数民族大多有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而汉族中信教人数比例既不大，且信仰多种宗教。

第二，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习惯融合，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如在历史上有的少数民族中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有些少数民族把宗教寺庙看成是民族存在的象征。汉族的宗教尽管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与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的结合程度，远不如少数民族那样紧密。

第三，社会作用大。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一直发挥着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的作用。如儿童的启蒙教育往往是在寺庙里阅读宗教书籍。宗教教义、戒律成为维护社会生活的共同道德规范。汉族中宗教的社会作用远远不如少数民族。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旧社会，汉族群众中的宗教观念、鬼神观念还是比较普遍的。许多人既信佛、又信道，没有十分固定的信仰，平时似乎不虔诚，但遇到天灾人祸，参加迷信活动的人则不少。群众中的这种鬼神观念，是宗教存在、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解放前，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并同社会的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解放后这种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

## （二）宗教的发生、发展和消亡

我国实行宗教信侧自由政策的历史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只能采取这个政策而不能采取其他的政策？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宗教的基本认识而决定的，也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就是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突出表现就是宣扬超自然，超人间的的神密境界和主宰万物的超自然、超人间的的神秘力量（上帝、神、佛或别的超自然、超人间的的神秘办量），以超自然、超人间的的神秘力量的形式，歪曲地反映客世界。由于人们反映这种神秘境界和神秘力量的形式不同，因而就出现不同的宗教。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意识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宗教并不是一有人类社会就有、也不是后来谁人臆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才产生的。考古发掘证明，宗教产生的年代不会早于“尼安德特人”时代。“尼人”的安葬头东脚西，周围撒放红色碎石片和工具。“尼人”距今约四万至十万年之前。其后的遗迹是我国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其遗骸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并有装饰品随葬。“山顶洞人”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前。可见宗教只有十余万年历史，同人类百万年历史相比，要晚得多。

宗教观态产生于原始人类，当时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受制于自然，对各种自然现象，诸如日月星辰的运转，昼夜更替，季节变化，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无法解释，对饥饿寒冷，洪水猛兽，疾病死亡等，感到恐惧，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有意识地支配着的。认为这种力量超于人类社会之上，是一切自然现象的主宰者，并对它加以崇拜，企图用各种祈祷的方法求它消灾降福，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原始人类的宗教信仰根源于自然力的压迫，是对自然力量无能为力的表现，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大低，人类知识不足以正确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人类和自然界作了歪曲解释的结果。另外，原始人也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和人体的生理活动，不懂人为什么要做梦，不能解释梦里千奇百怪的现象，误以为梦境的活动不是人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立的灵魂的活动。在原始人看来，灵魂寓居人体，死后离开人体，由此而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这些说明，原始人把支配自己的自然力人格化，变成超自然力的神灵，形成最初的有神论观念，并由最初的自然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

到了阶级社会，人们在自然力之外，又受到一个同样不可理解的支配力量即社会力量的压迫，这就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而感到恐惧和绝望，认为在社会之上也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在支配一切。于是人们把摆脱苦难，祈求幸福的希望从地上搬到“天国”，从现世搬到“来世”，产生了神灵崇拜。列宁指出：“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古人化石，1856年在德国社塞尔多夫尼安德特河流域附近的洞穴中发现。广义的尼安德特人是古人阶段所有人类化石的总称。

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而剥削阶级正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他们把根本不存在的“极乐世界”、“天堂”大肆渲染，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既然宗教的来源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那末，宗教的消亡，旧根到底，就要从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中找出路，而不能用强迫和禁止的办法。强迫和禁止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宗教消亡的目的，反而会助长宗教信徒的宗教狂热，不利于团结有不同信仰的人民为争取社会解放和自然解放而进行的共同斗争。随着人类社会阶级压迫的消灭，随着人们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加强，宗教信仰必然逐步地削弱以至消亡。

总之，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和一切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并不是永恒的东西。当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它就会消亡。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转变为“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这就是说，宗教的消亡，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物质生活条件；就是说，那时的社会关系已经极其鲜明合理，为人们所了解，人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不仅能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能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造福。只有到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发生、发展、消亡的原理，揭示了宗教的属性和本质是人的属性和本质的异化，是颠倒的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的传播必然阻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能正确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对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高度概括，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进一步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宗教的这种本质和社会作用，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宗教对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在理论、道德和感情上起着论证与辩护的作用。宗教以上帝和神灵的名义对剥削社会的合理性作了种种神学的论证，指出人们的苦难生活不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剥削压迫制度，而是由于“原罪”、由于人们前世做了坏事，把人们受苦难的根源归咎于自己，避免人们向现实的苦难进行斗争，从而起了维护剥削阶级社会的作用。因此，宗教对占居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十分有利的，是他们实行统治的有力工具。

第二，宗教给人民以“幻想的幸福”，为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幻想的花朵”。宗教不是引导人们面向现实，而是要人们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来世

---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的天堂。宗教所关心的不是人们现世的苦难，而是来世的幸福。它要求人们自觉地忍受一切现世的痛苦，甚至要求人们去爱剥削压迫的仇敌，以便换得死后的天国幸福。第三，宗教为人们设想了一个虚幻的救世主，要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上帝和神灵。宗教使人们盲目地相信人类本身就是一个苦海，人们对于苦难的叹息和抗议，除了祈求上帝赐予恩慈之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上述诸方面清楚地显示了宗教的麻醉剂作用，它要求人们对现实的一切抱虚幻的态度，而对虚幻的神灵和天国则反而要持虔诚的现实态度。宗教成了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三）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变化及其特点

周恩来支持我国宗教的革新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国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大影响。宗教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起过很大的消极作用，它被剥削阶级作为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者还利用宗教束缚人民的思想，反对人民革命，为维护剥削制度和反动统治服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和其他人民群众一样，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和经济上的解放，为宗教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控制，逐步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创造了条件。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的方针政策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等等。周恩来热情地赞同和支持宗教界的爱国民主的行动。

1950年5月，吴耀宗等基督教人士会同北京、天津基督教人士谒见周恩来，反映当时基督教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周恩来在百忙中约吴耀宗等人谈过三个整夜。在谈话中，基督教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长期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这是它与新中国难以协调的症结所在。他们根据中国爱国教徒多年来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决定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当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说：“要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今天宗教界自己发起了一个民族自觉运动，把近百年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一下。”他赞扬说：“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我国宗教界寄以殷切的希望。他指出：“宗教界（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在内）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在政治上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新中国有益的。”这些指示对我国宗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努力革新，我国宗教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改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废除了宗教压迫和宗教剥削。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宗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阶级根源随之基本消失。废除了宗教的剥削

---

《深切怀念周总理》，《人民政协报》1986年1月7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1—182页。

和压迫，各寺庙观堂都组织生产劳动，实现了自食其力。第二，建立了宗教爱国组织，割断了教会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的爱国人士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的基督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以后，各宗教相继成立爱国宗教团体。从此，我国宗教就切断了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实现了中国信教群众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己管理宗教的愿望。这样，中国的各种宗教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办的宗教事业。宗教的消极作用受到限制，宗教中的好传统得以发扬。第三，宗教已经同国家政权、法律和教育相分离，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从与国家政权有密切关系的一种思想工具，转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思想信仰。这样，宗教领域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剥削阶级在宗教领域里进行政治活动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情况，已成历史的陈迹。这样，信教与不信教的矛盾，信仰这一宗教与信仰那一宗教的矛盾，信仰同一宗教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就不再是反映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而只是主张有神与无神、主张信奉这个神与那个神之间的认识问题了。第四，宗教界人士和各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绝大多数是爱国守法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宪法，反对社会主义甚至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只是极少数。第五，宗教的某些观点、规章和制度等，发出了一些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

第六，广大信教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少的教徒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宗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本质并没有变。因为宗教的基本命题，诸如神与人、灵魂与肉体、地狱与天国、善与恶等传统内容，依然保存着。所谓宗教的基本命题，就是使宗教得以存在和立足的一些理论观念。如果这些说教没有了，宗教便不成其为宗教。宗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伟大成就，往往从神学角度加以解释；而对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又往往加以夸大和绝对化，并使之成为异己力量，要人们加以崇拜。在世界观上，宗教仍然主张神创世界、神主宰世界，提倡“拯救自己的灵魂”，追求“来世”的幸福等等，这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主张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世界，提倡大公无私，为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是相对立的。

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与以往历史上阶级社会的宗教相比，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种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旧社会的痕迹。它仍然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歪曲的反映，因而它具有消极性与荒谬性的特点，这同以往历史上的宗教是一样的。从思想体系上看，宗教与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赞同任何宗教，必须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反对任何调和宗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行为。我们说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宗教，但并不意味着宗教就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需要宗教。如果说在历史上曾有过劳动人民利用宗教作外衣以反对剥削者，那末，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这样的时期早已过

去了。”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解放事业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利用宗教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时期有宗教，但没有“社会主义宗教”。

第二，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削弱，直到最后走向消亡。社会主义事业是要消除一切社会苦难，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人民造福，使长期同人们对立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逐渐为人们所支配。因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宗教，它不会象以往在私有制度下那样兴旺发达，其发展总趋势是逐渐削弱，逐步走向消亡。在它逐渐削弱的过程中，可能有时会出现起伏，甚至有时会出现某些回升现象，但却改变不了逐渐削弱、逐步走向消亡的总的历史趋势。这一特点决定宗教既不会很快消失，也不会永世长存。对它既不可操切从事，也不能放任自流。

第三，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上消失，宗教不是剥削阶级用来麻醉和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而是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一般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宗教是剥削阶级麻醉和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那时的宗教问题则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时期，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宗教不再是哪个阶级的工具，而是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由于这一特点，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宗教必须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因为宗教信仰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对待，必须采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来解决宗教问题。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科学知识水平将逐步得到提高，因而宗教就会失去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最后走向消亡。

#### （四）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

周恩来论宗教现象存在的长期性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存在，已被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性的问题上，周恩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我国实际出发，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1951年，周恩来谈到有人以为天主教徒“一分到土地就不信教了，天主教的基础就没有了。”他说：“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信教的。”1957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恩来又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他列举共产党内有的农民党员怕鬼的例子说：“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

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宗教长期性的估计，是把它作为一种范围广泛和根源深厚的社会现象来考虑的。

周恩来还指出：“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宗教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宗教得以存在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宗教会长期存在？

第一，人们的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它虽然从经济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却不能立刻消除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仍然会长期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虽然是由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可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不会立刻随之而变化，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在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基本上消灭之后，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不会立刻消除，而会仍然存在。因为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长期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旧思想，旧习惯和旧传统。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和旧传统都具有保守性。宗教则是其中保守性较强的一种，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宗教职业者的倡导和雕琢而流传至今。凡流传下来的各宗教，都拥有浩繁的经典、庞大的组织、严格的戒律、成批的专业人员、众多的信徒；其思想信仰和道德规范，已经深入信仰者的思想感情和日常生活中，有的还与某些民族习俗交织在一起，世代绵延。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和思想意识，绝不会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很快消失。犹如私有制已被推翻，而私有观念仍然长期存在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宗教还会存在于信仰者的意识之中。宗教是经过千百年形成、发展和完备起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旧传统，它对社会变动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变化很大，它却能适应各种社会变动而保存下来，这说明它决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01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3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4页。

要清除它，决非轻而易举，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办不到的。因而，宗教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生产力还较低，自然力量的压迫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们支配自然、造福人类，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较差，科学技术还较落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较差，不可能完全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有些农村还相当穷困。列宁曾经指出：“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生活上的穷困给人们带来痛苦；愚昧落后容易使人们盲从。因此，在穷困落后的地区，宗教最易于存在和发展，一些觉悟不高的人，看不到造成穷困和愚昧落后的原因，会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天国”的幸福，这就为宗教的存在和传播留下了地盘。解放前，我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况，农业凋敝，工业衰微。解放后虽然有很大转变，但是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教育、就业、住宅、婚姻、人口、家庭、卫生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一下完全解决。要彻底改变我国穷困落后的面貌，决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距离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境地，仍然相差甚远。同时，由于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残余的存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也有很大的阻力。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极大提高，仍然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

沉重的自然界的压迫，曾经是原始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可以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抗灾斗争，但是，要完全有效地抵御自然界各种灾害，还要走很长的路。人类到现在尚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居住的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更不要说征服太阳系和宇宙空间了。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都无法应付地震、飓风和特大旱涝等自然灾害。而且在人们周围还有许多自然之谜，至今尚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甚至还未揭示出它们的真相。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科学知识不够普及的情况下，一些尚未为科学占领的地带，或一些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奇特的自然现象，就会引起某些人的神秘感，宗教就会利用人们对它们的无知乘虚而入，使某些人接受条教有神论的宣传，成为宗教传播和存在的土壤。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不久，也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人们还不可能完全自觉地认识和把握一切社会发展规律，不能完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开始走向劳动人民自觉地支配生产和分配的道路。但是，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并不等于它的各项具体制度都尽善尽美，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它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在具体制度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还不够完善，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和缺陷，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要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生产关系的各部分完全合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长

时间的反复探索，积累经验，人们才能获得较大的主动权，才有较大的“自由”。此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还存在着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残余。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里，还会产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诈骗走私，利用职权侵占国家财产等犯罪活动。这是一股具有极大破坏性和腐蚀性的社会力量，是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上述种种社会现象说明，人们还没有支配一切社会关系，没有从“必然王国”完全达到“自由王国”，还不可能完全避免社会关系中的一些盲目性的侵袭。因而在某些“天灾人祸”面前，人们还不能完全自觉地支配自己的命运，甚至会使人感到无能为力。因此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就会相信“天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或“天国”。这样，就会为宗教的散播留下空隙。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清除干净；在我国一部分领土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存在；我国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同国际资产阶级打交道，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对国内产生影响。因此，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就给宗教的生存留下余地。因为阶级斗争的存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实现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有时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有蒙上宗教阴影的可能。有人可能会把宗教教义作为观察社会和人生的指导，从而相信宗教。在某些旧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中，也含有一些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与宗教观念相互影响，不仅对老年人有影响，而且对青年人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虽然宗教不可能再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所利用，但还有可能被个别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所利用，利用它作为掩护，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破坏活动。一些宗教偏见比较严重的人，会千方百计地扩大宗教影响。国际上的宗教也会对国内产生影响。在世界总人口中，宗教徒为数不少；宗教还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宗教普遍存在的国际环境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宗教方面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互相影响，从而有利于宗教存在。因而在单独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特别是国际上的宗教反动势力，会利用各种机会，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妄图控制我国的宗教组织，以达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总之，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宗教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是有客观条件的。由于这些条件，决定宗教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只有消灭了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宗教才会逐渐走向消亡，这是宗教发展的规律。

我国宗教存在的“五性”宗教除具有长期性外，还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即我国宗教的“五性”。在我国，信教群众在总人口中虽然占少数，但在少数民族中却占多数。据解放初期统计：佛教（包括喇嘛教）的僧、尼、喇嘛、全国有四十多万人，佛教徒有几百万人。伊斯兰教的信徒有八百多万人。基督教徒有七十多万人、天主教徒有二百多万人。我国信仰各宗教的群众，约有三千万人左右，这个绝对数是不小的。建国以来，情况虽有变化，但仍然是群众性的问题。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反复证明，宗教的

发展与削弱，并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宗教本身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人们是否信教，信教人数增减，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决定的。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信仰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包括喇嘛教）在回、维吾尔等十个少数民族和蒙、藏、傣等少数民族中，几乎还是全民信仰的宗教。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些民族中的许多传统婚丧仪式和群众性的节日活动，虽然含有某些宗教色彩和宗教传统，但实质上已成为民族风俗习惯的组成部分。宗教影响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宗教上层人士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具体分析和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宗教信仰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是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对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重大作用，在有些国家中甚至左右其政治形势和国策。各宗教都有自己的国际联系，各国教徒经常进行密切交往，各国宗教界的动向往往互相影响，从而影响国际关系。因此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对发展国际交往，扩大反霸统一战线，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宗教的复杂性除表现在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等方面外，还表现在宗教形式的多样性。仅以世界三大宗教而论，每一宗教皆分为形形色色的各种宗派，每一宗派内部的组织机构、教义、教规、制度和仪式等等，也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各宗教皆积累了浩繁的经典，纷坛的学说，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各民族、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宗教问题不仅涉及人民群众的信仰问题，也涉及人们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仅有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有敌我矛盾。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类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关系非常复杂。

宗教的“五性”，是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按照这个看法开展宗教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到五十年代末特别是“文革”中，这一科学认识被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重申宗教“五性”。这一科学认识，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宗教思想。

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对宗教的科学认识，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批判宗教本质和社会作用的同时，总是对信教群众抱有极大的关怀和同情。列宁反复强调：“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sup>①</sup>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同时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避免加剧宗教狂。”<sup>②</sup>坚决反对那种强迫命令和粗暴的“灭教”行动。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是“提

---

①、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页。第3卷，第746页。

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是“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宗教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2页。

## （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宗教的基本政策

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坚持“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建国后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上相继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

这项政策和法律的含义是非常明白的，对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这种宗教（包括教派）的自由，也有信别种宗教的自由：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都是自由的，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加以干涉。每个公民，不论是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信这种教或信别种教的，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我们国家，没有占统治地位或特殊地位的宗教。国家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加歧视。

党和国家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宗教的科学分析，根据宗教发展规律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同时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然宗教是一种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基础，人们要正确处理它，就只能制定符合其客观规律的政策，而别无其他选择。

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并促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三大任务”而奋斗。列宁说：“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我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和政治上的一致。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才能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不信教的人们一道，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能否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所谓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既包括共产党和国家要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策；也包括宗教本身要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否则也会同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这里提适应，就是因为有不适应，也有可能适应；这里讲协调，是因为有不协调，也有可能协调。因此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对宗教活动的方向要善于引导，即一方面要逐步去掉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于四化建设，不利于精神文明的东西；另一方面要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1页。

毛泽东：《1952年接见西藏致敬团人员的讲话》。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发扬宗教中的好传统，为社会主义多做好事。周恩来曾说：“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宗教中的积极作用，如天主教、基督教办学校、医院；佛教提出农禅并重、重视学术研究；喇嘛教的医术；道教和佛教的武功、修炼方法等等。开展对宗教文化的学术研究，批判地继承其优秀部分，可以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库。

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宗教徒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亦即宗教徒和不信教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合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57年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国存在着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彼此相处得很好”。“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他还说：“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在我国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实践，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已得到基本解决，现正在进一步协调之中。随着我国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消失，我国的社会状况和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宗教的组织、思想、仪式和规戒等也发生了并正在继续发生着为适应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巨大变化，其结果就使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不断协调的过程中。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富裕、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

第二，宗教界在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宗教的某些思想、信仰、道德和行为，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教育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爱国守法，服务人群，造福社会。

第三，开展对宗教文化的学术研究。宗教界在宗教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等领域内，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特点，为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为什么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

第一，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动而不断变动的，因此，它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解放前许多劳动群众信教，是出于寻求解放的愿望。当社会主义革命给他们带来了现实的幸福以后，他们认自己的信仰和教义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虽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是觉悟不高的表现，但他们却因此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消失了，宗教已成了人民中的信教者自办的事业，宗教的麻醉作用能受到限制，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

第四，共产党和国家对宗教采取正确的政策，并认真贯彻执行：宗教界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8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7页，第333—384页。

人士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同努力，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种协调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为准绳，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标准。在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强求思想信仰上完全一致，是办不到的。周恩来曾经说过：“拿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说：“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一切人都有同样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宗教徒可以同不信仰宗教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合作。

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保护不信教的自由。这同保护信仰宗教的自由，是并行不悖的。二者的统一和不可分割，完整地构成了共产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唯物主主，反对唯心主义，坚持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焕发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四化建设。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无神论的最好学校。正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广义的无神论教育。这些宣传教育当然应该结合社会实践，照顾群众的觉悟程度。这是四化建设的需要，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起码要求。

保护信仰宗教自由、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真诚地团结合作，决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对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与无神论的思想教育，去适应宗教信仰主义的需要。同样，承认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决不意味着强迫命令，粗暴地抑制群众的宗教信仰，也不是要在教徒群众中去批判宗教，更不是主张使用行政手段去折毁寺庙，焚毁经典，强行禁止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伤害群众的宗教感情。

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积极的政策，它和资产阶级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是表示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在反对教会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以后就成为制造宗教纠纷，掀起宗教狂热，分裂人民，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宗教政策，则是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求同存异，为最后克服宗教异化现象，消灭产生宗教的世俗基础，“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建立人间天堂开辟道路。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是暂时政策，也非权宜之计，而是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的长期的根本的政策，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这一政策，做好宗教工作，还必须认真执行中国共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4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6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1 页。

产党和国家规定的若干具体政策，以便划清政策界线。

在我国，正确处理宗教问题，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对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宗教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共产党和国家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 五、周恩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胡耀邦指出：“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而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时间内，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最大的贡献的，则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不愧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

要深入学习和理解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所作的最大贡献，以指导我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就必须同时深入了解周恩来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的丰功伟绩。所以，本书除在前四个部分初步地分别学习了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的几个重要方面外，还准备按照历史顺序，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周恩来一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生动的模范事迹，加深我们对他的杰出贡献的研究。

## （一）周恩来的初期统一战线思想

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了。

五四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萌发了统一战线的思想。

李大钊、毛泽东都先后提出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周恩来在五四爱国统一战线运动中也以民众的大联合为其指导思想，积极倡导和组织革命活动，这可以说是他组织、领导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起点。

早在 1911 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就开始学习做团结群众、联络各阶层的工作。1914 年 3、4 月间，他邀集二十多个同学组织了“敬业同乐会”，以自己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影响大家，把一大批同学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唤醒群众觉悟。1915 年 6 月 6 日，他在天津救国储金募款大会上，针对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响亮地提出，救国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爱国志士决不愿借外债以度日”的口号，受到各界群众拥护。1917 年秋，周恩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留学。这时，发生了列宁领导的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恩来在日本受到强烈的影响和极大的鼓舞。他读了许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刊物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1919 年 4 月，周恩来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军阀的罪行，回到天津，投入到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

周恩来认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强权、军阀的强权，必须依靠人民大众联合起来的力量。他受天津学生联合会委托，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上面发表许多文章，号召各界、各阶层、各团体迅速联合起来，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示威等一致的行动，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周恩来向学生指出，学生必须努力“做群众运动”，学生运动必须得到各界的响应和支持，必须和各界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浩大的力量。8 月 9 日，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讨安福派的办法》的专文，尖锐指出：“天天打电报，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是打不倒安福派的。“捉贼同贼窝里的人讲话，一定不能达到的”，“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同业工会，尤其要紧；第二是男女学生天天外出讲演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国事知道真相”。周恩来在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起草的《天津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中强调：只要各界、各阶层、各团体有力地联合起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他呼吁“全国一致，互作声援”，打烂旧社会的秩序，捣乱反动派的安宁，周恩来为了促进天津各爱国团体的联合，四处奔走。他和学联会长湛志笃等，多次找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商议成立各界联合团体问题。在周恩来等人的推动下，6 月 18 日，天津各

界 30 多个团体， 170 多个单位，包括工人、学生、妇女、新闻界，教育界、工商界、士绅、宗教界等各界人士代表 61 人，在天津总商会开会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统一战线在天津的形成，它是全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各界联合会，对全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开展斗争，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于 1919 年 9 月发起组织天津觉悟社。周恩来把觉悟社看做是一个促使自己不断觉悟，同时去做促使群众觉悟工作的组织。他要求觉悟社的同志要和民众团结一致，去做群众发动工作、联合工作，使民众协同动作，共同斗争。周恩来和觉悟社的成员团结广大学生，通过开办平民夜校、国民半日学校、工人星期日学校、工厂补习学校、人力车夫休息处等，采取进行讲演、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做教育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促使工人内部的团结和各阶层的联合。他们又和工人爱国十人团、工人罢工团、工界联合会等建立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共同进行斗争。周恩来到工厂发表演说，向工人进行宣传，提出“快快成立各种工会”的主张，号召工人实现阶级团结。觉悟社还以天津学联名义，电请上海全国学联出面约集全国各团体代表到天津集合，讨论到北京总统府前进行请愿斗争事宜。在觉悟社的联络下，上海、天津、南京、烟台、青岛、济南、蓬莱、黄县、河南、长辛店、通县等地代表汇集天津，到北京发动了一场在总统府前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行动，在全国造的很大影响，推动了全国各界的联合行动。1920 年 8 月 18 日，觉悟社和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的代表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指导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的《改造联合宣言》明确提出，我们集合在“赤旗”下的青年，必须本着团结奋斗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劳动群众中去，联合他们，为改造旧中国，“组织起来切切实实做事”。《宣言》并且把“宣传事业之联合”确定为这些组织的中心任务。可见，天津地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是和周恩来的组织和领导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周恩来、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以能萌发统一战线思想的原因在于：第一、周恩来和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强烈地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指导，比较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认识到联合广大民众，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完成革命的必须，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之一。因此，他们实行民众的大联合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第二、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和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自觉地去启发教育民众、联合各阶层的民众的工作，反复地向各阶层的民众说明实现大联合的必要性。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分析，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看做是反革命的联合：把工人、农民、商人、教师、学生、店员等各阶级、各阶层的联合看做是革命的联合；认为只有革命的联合，才能压倒反革命的联合，从而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这种认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曾有过的。第三、周恩来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工农的力量，他们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使他们领导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当然，应当说这时候的周恩来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可能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但是不能否认，他们这时已经对民众的革命运动是民众绝大多数人参加的运动这个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说周恩来这时已萌发了统一战线思想，这是符合实际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发展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随着他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得到初步发展。五四运动后，1920年11月，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勤奋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开始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也开始有了真正的认识。他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需要实现自己的内部团结，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他寄回国内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系列报道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劳动阶级大联合的思想。他针对当时在法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因团结和工作问题及生活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向大家指出：“在法做工的华工和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切不可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当，而自相抵消了斗争的力量，唯有团结才有出路。“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齐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指出，无论是在法的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大家“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周恩来提请大家严重注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视，使各国资本家在对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成了国际间浑然一体的资本主义大联合”，他们“对待劳动阶级的步骤总是一致的，壁垒也是团结得很坚固的，劳动阶级的敌对，本只是资产阶级，他们深知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产阶级奋斗，结果只有退败。所以劳动阶级如果认清了敌我两方的情势，则无论各派在将来的改造方法如何，而在现在这种冲锋的阵势上，总应该力求联合，勉图一致，好免掉敌人乘间攻入的危险。”他总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认为列宁主张的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合，是对付资产阶级最有效的武器。列宁的法宝，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实现全劳动阶级的联合”，“因为没有前者，社会主义便失了凭借，没有后者，劳动世界也没有现今这样地热闹，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府，更无由产生了。”这一时期，周恩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少年》上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工友们》、《共产主义与中国》等，都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而无产者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联合就是实现这条道路的根本法子。他向劳动者大声疾呼，“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他明确指出，联合战线是拯救中国

的法子，我们“所持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

---

《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第298页。

《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第363页。

《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第341页。

同上书第337页。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赤光》第1期。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赤光》第1期。

可以看出，周恩来这时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对于争取这个前途的办法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分，开始了他的光辉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生涯。

1922年8月，中共中央的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决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法国推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23年3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到里昂与国民代表商讨国共合作，建立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同年6月，旅欧青年团员八十余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周恩来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特派员。11月，他又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实际担负起国民党驻欧支部负责任务。

他这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认识，以及已经开始从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他在轰轰烈烈的第始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从事和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开端。

## （二）周恩来对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

《革命救国论》的统战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从国民革命时期开始的。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国共合作成立时，周恩来还在巴黎。他一方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在法国推进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国内革命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发展。1924年2月15日，周恩来在《赤光》杂志上发表了《革命救国论》一文，提出了分清敌我友的思想。他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周恩来这一思想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形成，以及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都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形势，然后才能有团结之可能。”周恩来提出建立两个联合战线的主张。第一个是国际的联合战线。各国资产阶级虽然有他们各自的利益，但他们在压迫各自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方面，其利益又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联合起来不分国界地界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实行镇压。这种反革命的联合力量如此强大，各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也只能联合起来，才能压倒这种世界反革命的联合力量。他说：“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压迫阶级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一样，而且当着他们自己引起不可免的国际战争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周恩来认为，建立国际的革命联合战线、是从当今世界已经明显地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事情，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完成的事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要求。

第二是建立国内的革命联合战线。周恩来对国内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他首先指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强列——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讎。”“图私的新旧军阀”，“做掮客的洋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是军阀的支在，靠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们的“卖国的勾当乃越发做得兴旺，而帝国主义的列强亦遂特加他们以青睐”。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多”，“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个共同敌人，我们一定要认清。至于革命的动力，周恩来分析道：中国无产阶级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到“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了伟大的阶级力量，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备受中国军阀的凌辱，因此，他们“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庞大的农民阶级，他们一方面感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强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页。

盗的为害，另一方面军阀的祸国殃民，也使他们不可终日，因此，农民阶级革命势力的发展，也是必须十分注意的。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说：“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论，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虽说是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赶不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除非他们甘于卖国，甘与外人合办。但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自己也知要起来过问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好的现象。”在这里，周恩来初步勾画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性的阶级性，指出了他们还具有革命性一面，能够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的特点。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此外，华侨和青年学生，他们历来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军阀的地位，特别是青年学生，“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他们在历次爱国运动中表现突出。

所以，“上述的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关于国际联合战线和国内联合战线的关系，周恩来指出，这两个革命统一战线是目标一致，互为声援的。我们要与以列宁的俄罗斯苏维埃为中心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作战，“以统一前敌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成功的。”周恩来通过阶级分析提出的关于建立两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把中国革命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把它放在世界革命的有机整体中去考察，坚持认为实现全人类无产阶级的联合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实现国内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是取得革命成功的保证；他并且具体分析国内各阶级的状况，论证了建立国内五大势力联合的必要性。所有这些观点，反映了党在这一时期对于统一战线认识的高水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统一战线问题的初步成果。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1924年秋，周恩来回到国内，立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在参加平定军阀陈炯明的两次叛乱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他十分注意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和发展，并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4年，英帝国主义策动买办资产阶级发动的武装商团叛乱，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10月10日，中共两广区委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在第一公园，召开声讨反动商团的示威大会，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分在大会上发言。他针对国民党决策人物在关键时刻看不到群众的伟大力量，表现出软弱和退让的态度，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为先驱，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接着周恩来又发表文章，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他号召以工农的联合为主力，推动革命发展，要求“其速自起！”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5页。

《在大革命的峥嵘岁月里》《人民的好总理》上第156页。

其速联合！其速组织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由于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帮助，广东革命政府在工农武装力量和群众的协助下，迅速平定了商团的反革命叛乱。

周恩来对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右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由于种种原因，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民党改组时，继续存在于统一战线中，使统一战线出现复杂的情况，他们反对国民革命、及对国共合作，在统一战线中制造分裂、排斥工农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直接表现为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斗争，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国民党右派及在广东的各派军阀立即蠢蠢欲动，企图夺取广东政权。12月31日，周恩来发表《中山北上后之广东》一文，指出：“在中山北上前，一般国民党右派以及广东各大军阀群聚于广东，争权夺利。”现在，“他们乘着中山北上无人监督的机会，群起攘夺广州的权利地位，其中最活跃的自要算代行之元帅职权、留守广东的代帅兼省长的胡汉民。”周恩来揭露，国民党右派就是隐藏在统一战线中的敌人，从“广东政治现象中，很明显地看出：国民党右派是永远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他提醒革命同志和广大群众要警惕右派的叛变行为，严防他们篡夺领导权。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更加露骨和猖獗。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支使下，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妄图破坏国共合作，颠覆广东革命政权。周恩来参加了廖案检查委员会，亲自提审在押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黄埔军校中，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在学生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打击和排斥左派，挑起事端。周恩来组织革命学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周恩来和毛泽东都主张反击蒋介石的进攻。1943年，周恩来总结这一段历史及教训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又掀起了一股反对工农运动和国共合作的逆流。周恩来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统一战线。他指出：“这时候放掉团结各派民主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以集中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向共同的敌人进攻，再没有其他的争斗。”至于说到共产党，“我们可以公然说，共产分子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反抗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都为办国民党而遭遇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周恩来指出，右派分裂只是一种必然现象，他们总是要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的。“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这种分裂并没有什么可惜，“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

---

《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工农旬刊》第9期。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14—31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62—63页。

《六大以前》第641—642页。

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周恩来对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坚决斗争，捍卫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对右倾投降主义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表现出的错误立场，也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周恩来在《现政治斗争之我们》一文中，对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作了精辟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篇文章阐述了如下重要思想。第一，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和完成国民革命这个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建立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这是“中国各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但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因此取消了各个阶级的差别。各个阶级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相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先驱。”“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而不应有何种独立主张。”“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共产党“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周恩来的思想，代表了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统一战线的正确认识，为共产党在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从理论上作了最早的论证。

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那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之我们》一文中，对这种右倾观点予以严厉批判。周恩来指出，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也形成了各派。”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各阶级都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因此，共广党员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以坚决的阶级斗争来反击右派，帮助左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评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斗争，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周恩来通过对统一战线内阶级关系的分析，明确提出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帮助国民党左派克服动摇妥协性，并以自己反击右派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左派力量。

尽管当时整个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经验还不足，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点还认识不足，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在统一战线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也还认识不足，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到陈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7—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03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9页。

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对于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认识更加清楚，他们开始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联系起来思考，要求中共中央立即组织武装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指出：“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由于陈独秀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无理地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积累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正确认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理论已开始萌芽。

### （三）周恩来对十年内战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

论统一战线的新特点十年内战时期的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所不同。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由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建立，革命和反革命的营垒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关于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的特点，周恩来指出：“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构成的阶级看，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大资产阶级跑了，因此，这时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就是广大农民，把这个统一战线称之为工农的统一战线是适当的；从它所担负的任务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的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它们的社会基础农村中的地主土豪劣绅，成为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这个任务仍然是反封建的性质，因此，同时把这个统一战线称之为“民主的”、“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即所谓‘宁汉合作’的时候，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

“这种情形在整个二十多年当中并不很多。”这时候，统一战线的力量缩小了，统一战线面临的更艰巨了。毛泽东指出这时的情况说：“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党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一百三十余次武装起义。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创立红军，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工农联盟为基本力量的统一战线获得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武装支柱。在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错误不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要是和“左”倾关门主义作斗争。关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相互关系的思想，是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对这一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证明：在中国，只有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有革命的胜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统一战线必须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一方面革命战争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来担负，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武装斗争胜利的保证；只有团结和壮大自己，才具有战胜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又是中国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95—96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96页。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统一战线的特色。统一战线工作必须直接地或间接地为武装斗争服务：统一战线必须有武装斗争作为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而革命战争又创造和发展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正是在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斗争中，探索着统一成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他和毛泽东等对“城市中心论”发生了怀疑，开始探索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密切注视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认真总结红军的斗争经验。到了1929年春天，他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在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同年9月，在他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他又再次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他和毛泽东几乎同时认识到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实质是在农村开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的前提是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只有领导农民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农村封建政权，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战争，来发展工农武装革命，应当将国内军阀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是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于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与护蒋两方皆是如此的。党在军阀混战中，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这一工作须与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这是走向以工农兵暴动的力量消灭军阀战争的正确道路。”“除工农兵暴动的力量外，绝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解决引起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应该坚决认定的。”这种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工农武装革命的思想，是这一时期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任务、特点、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互关系等正确认识的结晶，是从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出发的。因此，不能认为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停滞的、倒退的。如果这样认为，无疑是脱离实际，抽象地谈统一战线。

周恩来不仅指出了建立工农统一战线与进行武装斗争的相互关系，而且具体阐明了无产阶级能否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能否把农民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假使你们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统治乡村豪绅地主还没有到动摇恐慌的时候，还有大批武装力量来镇压你们，群众斗争还没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还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微小要求，甚至还没有做抗债、抗租、抗粮的行动，群众的发动也不广大，则这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6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页。

同上书，第3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6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31页。

种斗争即便是有了武装冲突，仍然是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还不是建立农民乡村政权的武装暴动。”周恩来还指出，在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时，共产党不应当提出一些大而不实的口号，而“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多”，但又决不把我们的斗争停留在日常的斗争上。“只有斗争的范围日益扩大，斗争有继续不断的小胜利，然后农民运动才会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才得在北方开始进行。”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党在十年内战时期，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附着着大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还有区别，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它和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在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有可能转而参加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共产党这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不应该是打击他们，而是争取他们。然而，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却把民族资产阶级错误地看做“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对他们实行只斗争不联合的政策，不去争取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不去利用敌人营垒的分化来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客观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意义。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坚决地认为，应当执行正确的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吸引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来。周恩来指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时，要特别注意不要侵犯“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在“对待中小商人及富农态度上”，“我们为实现党的政纲所规定及为工农经济流通与贫民利益，在城市不举行经济没收，这是对的。”“对富农及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并要防止其反动。”周恩来坚持在城市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在农村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指示党和红军在斗争中要注意争取中间阶段，这对保证土地革命顺利进行是有重要作用的。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的建立，表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必然发生尖锐冲突。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应当是欢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行动，并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左”倾冒险主义把福建人民政府的建立，看做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分裂的产物，是反动统治阶级耍出的一个政治欺骗手段，认定其对革命是非常有害的，因此主张共产党的方针是“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与“左”倾冒险主义相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欢迎福建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动，主张红军和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蒋抗日。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签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认“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周恩来和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参加与李济深蔡廷锴的代表为进一步谈判，达成抗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13日，在蒋介石派遣重兵企图扼杀福建人民政府的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40页。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1933年12月20日。

危急情况下，中共苏区中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起草了致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的紧急建议。建议指出；为了切实建立抗日反蒋的联合战线，共同对付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同动作，福建政府必须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武装，赞助和拥护广大群众参加抗日反蒋联合战线；保障各种抗日反蒋群众组织的合法存在；支持民众武装组织的抗日反蒋活动；肃清自己队伍内部的投降分子，并立即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与红军作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强调，建立反日反蒋的联合战线，将会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即使福州失陷，蒋介石不与日帝国主义者合作必不能长治久安，而这一联合战线在全国亦必日益开展无疑。”在福建政府处于危亡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在军事上给福建人民政府以具体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下，红军没有能够给福建人民政府以具体的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很快遭致失叛。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周恩来和朱德又进行了一次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活动。周恩来和朱德主持了同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军总指挥、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谈判。周恩来在总结统一战线的这一段历史经验时，如同毛泽东一样得出了“敌人的营垒是会变化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议断。他指出，不能用凝固的观点看问题，特别不能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福建事变证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他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统一战线中定型化的策略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和毛泽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理论之一。

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人的营垒是会变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不仅指出敌人营垒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变化的，可以从敌人营垒中重新分化出来，加入统一战线，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各派，在不同的形势下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因此，共产党应该利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为着某一目的而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从这一认识出发，周恩来做了大量争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英美派的工作，争取能和他们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党的互窑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之后，周恩来多次写信给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以及民主人士，呼吁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新的国共合作。他指出，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同室操戈”，“为暴日扫清道路”，使“民族之仇者所快”，“自消国力，自速某亡，”“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在日寇强敌压境的形势下，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停止对红军的进攻，集中全力的武力、人力、财力和智力，以举国一致的行动，实行全民族的斗争，才不致于将中国“拱手让人”。他说明，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汉奸的需要，蒋介石如果能“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他向蒋介石表明：“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3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99页。

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周恩来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对于争取国民党内英美派在抗日问题上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方面。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领导这一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1人，以红军将领名义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重申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意和东北军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全国人民的抗日先锋。为达此目的，欢迎东北军派代表到苏区考查，双方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救国大计。1936年4月9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赴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现出共产党员人坦荡的胸怀，诚恳待人的态度，以及高度的政治修养，渊博的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给张学良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双方就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就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联苏、红军集中、互派常驻代表等达成一致协议。在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的推动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迅速改善。两军间实际已达成停战协议。经过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的巨大努力，红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西北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经过反复研究，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极大的鼓舞。周恩来向张学良、杨虎城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并向东西北军将士宣传中共关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突出一个“逼”字，体现了高度的斗争艺术，胜利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使命。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对何应钦等人的“讨伐”政策竭力反对，力主通过谈判营救蒋介石，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在华利益，也主张通过谈判使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英美派的态度给“逼蒋抗日”造成一定的可能性。周恩来认为，对蒋介石及英美派采取逼的方针，就是要他们接受抗日的主张，“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逼是为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因此在策略上要有灵活活性，只要蒋介石“确有转机”、“确具诚意”，那就要在适当时候让蒋介石回南京。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上述策略。12月23日，周恩来开始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会谈。经过两天充满斗争、说服的紧张谈判，二宋基本接受中共中央的主张，达成了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展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

的救国办法。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一次表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真诚愿望；并且向蒋介石严肃指出，目前的形势，非抗战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不但不杀他，而且对他寄以希望的作法，深感意外，表示今后不再发动反共内战，同意谈判达成的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去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高超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西安事变刚刚结束，周恩来立即投入统一战线实际建立的紧张斗争中。12月29日，他在从西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的实施，提出中肯的建议。他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中共的全部工作必须转变使之适合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由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组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周恩来提出的策略是：“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周恩来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但他的上述思想已经明显地包含了这个策略原则。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南京处于向抗日过渡的情况下，“他们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对他们这种摇摆不是迁就，也不是退让，“我们应当与他们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这实际上就是以斗争求联合的正确方针。

周恩来还主张立即向国民党提出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要求，同时发动浩大的人民促进运动，把这两者联结起来，“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周恩来指出：“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为此，红军要采取一切措施进一步加强和东、西北军的友谊、信任和尊重，帮助东、西北军进一步改造、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地方政权的民主化和改造。

周恩来对发动西安事变有功的东北军本身的团结作了许多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东北内部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派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67军军长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在反动派的挑动下，少壮派军官于1937年2月2日晨刺杀了王以哲，使东北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接着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赴豫、皖，使东北军陷入孤立境地，有可能被蒋介石消灭掉。1937年3月18日，周恩来从西安写信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并转中共河北省委，要求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周恩来指出，在巩固国内和平，加速准备抗日的总任务下，“东北军和东北流亡人民中的工作仍是最重要的一环，”巩固东北军的团结，是新的任务，现在‘双二’杀王事变所造成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版。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7页。

东北军内部的分化，因为亲日派的播弄，还在继续下去。东北军的东调，将更加增加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估计到东北军及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的数目并有相当的组织，“因此，建立东北群众的统一战线并用群众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这一任务，现在应当主要地由北方党来负担起来。”

周恩来向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提议，发展东北群众的统一战线的中心，是抓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的工作。要整顿并充实现有的东北各种救亡组织；要把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要把建立整个东北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联系起来，利用选举运动来团结东北军内部；要在东北军中发展中共的组织，注意把那些有觉悟的团营长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内来。所有工作都“应特别注意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否则，只是以团结一部分左倾分子为满足，那不但无益，反而会加深东北军的分裂。”\_周恩来的这封信为进一步做好东北军的统线工作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作为中共主要谈判代表，从1937年2月中旬起至9月下旬，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和国民党进行了六次艰苦的谈判。在谈判中、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抵制了蒋介石借谈判压共产党投降和消灭共产党、红军的企图。周恩来后来回顾说：“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在谈判中，开始国民党不同意共产党军队有师的编制，只准编三个团，后增为六个团、九个团，人数只准编三千到六千人。以后经过中共代表据理反驳，虽然同意编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但每师只准有三千人，三个师还不到一万人；改编后的红军，其管理教育必须属国民党行营；反对设立总司令部，只同意设立政治训练处来指挥部队（后改设政治部）；主任由周恩来担任，副主任由康泽担任。此外，还要向三个师派参谋长，向各级派副职；还提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学的无理要求。周恩来在谈判中据理驳斥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提出中共最后的方案：同意编为三师六旅十二团，但每师人数不得少于一万五千人，其他骑马、炮兵、通讯、辎重部队编为直属队，地方红军改为保安队和民团。红军在三师之上设总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保持红军的独立性和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各级指挥人员由中共方面推荐，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中共军队派遣任何军政人员。周恩来和中共方面谈判代表的坚决斗争，终于抵制了蒋介石控制和瓦解红军的企图。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为了开赴前线抗战，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改编。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之后，8月18日，蒋介石才宣布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经过艰巨的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1937年7月4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7月15日提交蒋介石。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上述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8，39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2页。

#### （四）周恩来对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所作的贡献

周恩来在武汉期间的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新的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

“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故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实践中，正是抓住争取国内民主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并通过这一中心任务，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国内民主，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出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各党派联盟的主张；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党从坚持一党专政立场出发，提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加以溶化。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可以建立一个联盟的形式，也可以如同大革命时期一样，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但不管采取那种形式，都必须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对于中共代表提出的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国民党只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尽管如同周恩来指出那样，“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共产党员在参政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从团结抗战的全局出发，共产党受聘的七名参政员，除毛泽东外，还是参加了第一次会议。

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唯一一个有两党参加的组织。当时，周恩来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忘我地工作。他接待大批来访的进步人士，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持久战思想；热情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还对许多外国友人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会见他们，向他们解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并派人把他们送到延安。周恩来经常对广大群众、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教育界和青年等发表讲演。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的《新华日报》创刊号上，周恩来题写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题词，鼓励各界为抗战不懈奋斗。1938年8月，国民党当局为了限制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群众组织的蓬勃发展，勒令解散一些抗日民众团体。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载文，对国民党当局进行谴责。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三次到武汉大学讲演。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的环境中，我们青年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周恩来要求青年学生到军队去，到战地去、到乡村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分散到群众中去，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那

我们的力量将是无比的！周恩来的演讲，在武汉三镇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学生在周恩来的号召下，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中。周恩来高度重视组织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在他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周恩来又委托阳翰笙筹备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8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周恩来被推举为成立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他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号召文艺家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着抗战，不分信仰，实现空前团结，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协”成立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名誉理事，根据他的建议，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具体领导“文协”。“文协”从战立之日起直到抗战胜利，一直坚持活动，成为团结文艺家的一个坚强阵地。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动员和支持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通过第三厅的工作，团结文艺家去发动群众，支持长期抗战。周恩来批评一些人对三厅在统战工作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错误，他对阳翰笙说：“有些有清高思想的人，对第三厅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改革政府组织，政权公开。国民党就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就要搞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权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国抗战作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郭沫若的主持下，第三厅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民众支援抗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周恩来由武汉经长沙、衡阳、桂林，于12月来到重庆。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直接领导着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并对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等进行广泛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政、限制和取消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重庆时期的统战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中进行的。周恩来在重庆期间进行的统战工作，正如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的：“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这是很有道理的。首先，承认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现实。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他拥有全国性的政权、财政和相当数量的兵力。国民党是投降还是留在抗日营垒内，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国民党的参加，就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其次，国民党是和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主要对手。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举足轻重。国民党利用它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否定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党必须主要地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斗争，才能保持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独立地位，保证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最后，以国共两党为主，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必要。只有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方针和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才能保证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得以实

现，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团结争取过来。周恩来提出“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方针，是和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一致的。毛泽东曾指出：“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周恩来在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自己的言行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真诚，对国民党抗战行动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1939年3月上旬，他在新四军军部礼堂向部队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强调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和友党友军的团结。他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我们采取帮助的方法，影响的方法，使友党友军感到我们是合作的朋友。”新四军的发展，要坚持向敌后发展的原则，“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周恩来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友党友军真诚相待。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开赴山西时，没有作战地图，当时在山西的周恩来、朱德知道后，立即派人送去地图。周恩来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和战斗力的提高也尽了努力。他派叶剑英等同志帮助国民党在衡山举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并亲自去给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讲述了敌、我两方面的政略和战略的发展变化及前途等十三个问题；以坚持抗战的思想武装国民党军人。他作为军委会政治部付部长，特别强调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武汉保卫战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他撰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指出：“两个月全国抗战的教训，很清楚而迫切地把改造军队使之适合民族抗战需要的大问题，提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特别是尖锐地提在国民党的面前。”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不是要将其改造成红军，而是恢复和发扬国民革命军的传统，“恢复以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骨干，使每个指挥员、战斗员，每个人懂得而且确信我们今天的抗战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为子孙，为着争取民族解放、民生幸福、民权自由这三大目的而奋斗，而且深刻了解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认识这是达到革命三民主义的唯一方策。”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言行，中共方面总是及时地予以支持。在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向国民政府诱降的声明，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后，蒋介石发表了驳斥近卫声明的讲话，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建议，共同开展反对汪精卫叛国投敌活动。中共参政员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提案，拥护蒋介石1938年12月26日对近卫声明的驳斥和他关于“共同反共即灭亡中国”的正确论断。“皖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逼降国民党，于1941年5月在中条山地带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国民党军队战败，丧失五万多兵力。蒋介石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予以肯定答复。在蒋军败退的情况下，八路军在北平公路主动出击，断绝交通，阻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79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4—10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2页，第9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2页，第95页。

止了日军的前进。事后，周恩来在致《大公报》的公开信中指出：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6月1日，周恩来向报界发表声明指出：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回头扫荡的挑战。我们应勉励勿为敌人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我们全中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一样，好击败敌人的进攻，击碎敌人的挑拨与流言。

6月15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社论《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表达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及其他政党合作到底的诚意。周恩来解释“民族至上”的口号说：“民族至上”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它是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一日寇，作生死存亡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这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关于“国家至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的统治机关，在今天的战争与当前的时代，殖民地以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卫祖国”和“国家至上”的口号的。中国必须抗战到底，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一个抗日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家。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和湘桂战役中大溃败，而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却变本加厉，激起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不满，民主运动风起之涌。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共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等五项建议。1944年11月和1945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两次同国民党谈判，以极大的诚意提出各种方案，要求国民党同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一专政的立场，企图取消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队的合法地位，谈判失败。周恩来在谈判中对国共合作的真诚态度，不仅为国内外人士所共睹，也是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皖南事变前后的又联合又斗争周恩来对于国民党，不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也注意到他们的反动性。因为，无论是“左”的和右的失误，都会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破坏。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1939年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询问中共中央对“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的意见，企图实现“溶共”政策。蒋介石说：汪精卫走了，现在是国共两党“团结”的好机会，要求周恩来致电延安请示，希望中共作出让步。周恩来明白表示国共两党合并“不可能。”他指出了国民党的反共、捕人的种种事实，证明国民党在团结问题上没有做到表里如一。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企图，另一方面建议：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一个贺电，表示共产党历来珍惜国共合作；团结进步，民主政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一贯愿望；要求国民党调查解决反共、捕人、杀人、封报、制造摩擦，甚至进攻边区等事件。中共中央完全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共两党为民族解放，抗战建国，理应长期合作，但两党绝不可能合并。“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周恩来对蒋介石反共、溶共政策的警惕，已

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的历史证明是十分重要的。“皖南事变”前夕，蒋介石又于1940年12月25日约见周恩来，说他不希望自相残杀，要中共军队开到黄河以北，是为中共着想。并威胁说：如果中共军队留在江北，冲突绝难避免。他断言：共军必败。他要周恩来说出新四军北撤的路线，叫嚷：“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以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攻。”蒋介石还称周恩来为“患难朋友”，提议为“和平与友谊”干杯。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一清二楚，警觉地意识到国民党对江南新四军将有所动作。12月26日，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报告他和蒋介石谈话情况，指出：“蒋在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他断定“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果然不出十天，国民党就发动了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向他提出严重抗议。周恩来又分别致电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强烈谴责他们的反动行为；并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撤回让路。周恩来动员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干部，四处出动，向各方面揭发国民党阻击新四军的罪行，散发了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抗议国民党的通电。接着，周恩来、叶剑英再次向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要求他们立即转告蒋介石，立即停止对新四军的围攻，否则国共合作破裂的责任将由国民党全部承担。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谈话，诬陷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周恩来获悉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向张冲提出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以极其愤怒和沉痛的心情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刊登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开了天窗的版面上，向广大读者揭露国民党的罪行。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一部分同志对时局发展的估计产生悲观情绪，认为国共两党的破裂已经开始，皖南事变就是新的“四·一二”政变。为了认清形势，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周恩来指出：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之后，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他强调要向最坏的可能作准备，争取好的结果。周恩来对时局的科学分析，纠正了皖南事变后部分同志的“左”倾情绪和悲观情绪。2月19日，他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进一步对时局和方针作出了估计。他认为：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尚未完结。由局部剿共到全面破裂还要有一个时间。我们仍应采取两面政策，利用各种矛盾以击破之。蒋介石是“抗战下的剿共，我是抗战下的反攻”。我们的反攻，主要是政治上全面进攻和军事上的局部反攻，以作好蒋介石全面剿共的准备，迫使蒋介石对国共合作表明态度。周恩来对时局的估计和建议与中共中央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但我们在政治上的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军事上的守势，政治上的攻势，这样不仅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关系，只有军事进攻才会妨碍蒋的抗日，才是错误的。

为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完全孤立，周恩来积极争取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对中共立场的同情和支持，做了大量工作。和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保持

密切联系的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监委、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剿共分裂政策的反动行为。电报指出：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甚嚣尘上，这是违背孙中山制定的联共政策的，也是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的。现今构成的剿共事实，不仅是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而且实足以使抗战建国之基础隳于一旦。电报要求蒋介石慎守孙中山遗训，撤销剿共布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平等地位。2月10日，周恩来又会见各民主党派代表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左舜生、张君等商谈时局问题，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参政员不出席第二届参政会的方针。接着，周恩来又会见在重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反共事件的若干材料。

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使他们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地位。8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探问中共中央最近意见。周恩来当面给蒋介石提出新四军问题和二月分国民党制造的各种压迫事件。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的坚决斗争下，宣告结束。周恩来同国民党蒋介石直接斗争的实践证明，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的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除了做好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外，还十分注重做好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1942年9月1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与小党为辅。但武汉时期太重视国共关系，冷落了小党派，为国民党吓着，受到损失。国共两党关系应充分注意，但在同时也应努力开展国共党以外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南方局在做好和各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当时在重庆的党派和团体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等，都先后和中共建立密切关系，倾向国民党的民社党和青年党也和中共有很多往来。皖南事变后，各中间党派和团体，更加向共产党靠拢，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1941年8月19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闭幕后九天，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具体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成立，标志着中共在争取中间力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1942年夏天，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重庆领事巷屈武的住所正式成立。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复杂斗争形势，加强对各方联系，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洞察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需要而成立的党的外围组织。该同盟由一部分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组成。出席成立会的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许宝、阳翰笙、阎刚侯、吴茂荪、侯外庐、屈武、阎宝航、高崇民、郭春涛、梁蔼然、赖亚力、曹孟君、谭惕吾共十八人，由王昆仑和许宝驹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作为中共南方局代表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周恩来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共苦，共患难，争取长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

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量的发展，既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和帮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我党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其他党派的办法，

企图孤立我党。2月20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派。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并提醒他们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政治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其这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就批评上层，影响某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就赞诗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由于坚持这种原则立场，使这些派别日益接受到共产党影响。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还尽量争取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他多次同康心之、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等民族资本家谈话，交换意见。1940年10月14日，周恩来、王梓木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教授，详细说明我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希望高能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做一件有益的工作，就是把西南的民族资本家联系起来，一致对抗四大家族，使民族资本不至于被四大家族兼并。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业家星期五聚餐会，在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他指出：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需要政治的安定，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是做到和平与民主两件事。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国民党在经济上管制得过多，统制得太过份，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蔽，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周恩来说，中国的资本形式应提倡三种：第一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我们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民族工业。今天中国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当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国的富强是大家的事情，所以工商界也应当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周恩来的讲演为民族工业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对于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对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十分出色。他指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1937年8月3日，刘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抗日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人心。”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可提供后备兵五百万，本人愿亲自率师赴前线。”会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刘湘寓所，对他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周恩来亲自做刘文辉的工作。1941年3月，周恩来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分和刘文辉联系，1942年2月，通过民盟人士的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里会见了刘文辉，谈话一个多小时，向他扼要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出努力的方向，鼓励他站在人民一边。事后，刘文辉深有感触地说：“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决定了我的政治前途。”同年6月，周恩来又指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刘处设立秘密电台。1943年，在蒋介石向刘文辉施加巨大压力的时候，王若飞先后两次会见刘文辉的

代表扬家桢，给予鼓励和帮助。解放初，刘文辉回忆周恩来对他的帮助和关怀时说：“毛主席提出的统战政策真伟大，在周总理的工作中则最完美地体现了这一政策。”

周恩来还指导做潘文华、郑锡侯、卢汉、龙云等人的工作。在潘文华处没有中共秘密电台。1938年，周恩来在成都时，在甘树人的参加下和潘文华直接进行洽谈。潘文华在后来国民党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中，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对所属部队内部共产党的秘密活动，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与周恩来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先后派朱家璧、张文澄、华岗等人到云南做卢汉和龙云的工作，促使其思想变化，争取他们站在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一边来。这些工作为后来解放大西南做好了准备。国民党的党政军中凡愿意抗日、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要人，周恩来都尽量争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是抗战派，对于国共合作抱真诚态度。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新华日报》以专页为其祝贺，周恩来发表专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赞扬他“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为民请命，为国效劳”的精神，表达了中共对坚持团结抗战的爱国人士的尊重和政治上的支持。周恩来对李济深、于右任、邵力子、孙科、王昆仑、朱学范、贺耀祖等，都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和共产党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国民党与中共的谈判对手张冲、张治中等，周恩来也真诚地和他们交朋友，肯定他们对建立国共合作关系的贡献。张冲病重时，周恩来曾数次前往探望慰问。张冲病逝后，周恩来在追悼大会上发表讲演，备述张冲为加强两党团结，共御日寇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亲自撰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词，以寄托哀思。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的文章，表达了共产党人对朋友的真诚怀念。在国民党上将张自忠（尽忱）殉国三周年的时候，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追念张尽忱（张自忠）上将》，号召大家学习他“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为消灭日寇团结到底，抗战到底。

开展群众性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认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各党派团体、上层人物，而且必须要有最广大群众参加。因此，在做好上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注意开展和做好群众性的下层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由上海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同他们仔细地研讨了江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强调，不仅要由八路军办事处出面，搞好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要注意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统战工作，要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后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在白区工作的一切地下党员，都担负着党的统战工作的任务。1910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周恩来总结统战工作的经验，和地下党活动的经验教训，要求地下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尽可能地广交朋友，都必须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以后又明确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等方法和策略。这对广泛开展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使广大群众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还亲自出席重庆有关群众大会，在会上向各阶层群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使各阶层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例如，1939年1月，周恩来、邓颖超到重庆沙坪坝参加了南开中学校友会。周恩来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形势和前途，以及青年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长篇

演说。他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日寇的有力武器。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当前我们的抗战正处在由一期战争转入二期战争的过渡阶段，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加强国内团结提高民族意识，坚定抗战意志，坚持全面的、全民的抗战，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十日晚，周恩来出席南开中学在市中区留春幄餐馆举行的新年聚餐会，又发表了《抗日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演，号召大家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1939年3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视察浙江绍兴地区，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政策，号召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等。周恩来和中央南方局非常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各组织间的统战工作、妇女的统战工作和青年统战工作。1939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发展和巩固工会组织》的社论，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对战胜民族敌人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在全国广大工人中，多一分组织，多一分团结，就多一分力量。全国性的总工会、地方工会，都要在日益团结中进步，没有组织的工人，也要认识到团结的重要，马上组织起来。4月20日，重庆市成立总工会，《新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献给重庆市总工会》的社论，指出，重庆市总工会是以全市各业的工会与工友作为基础的，它要使全市的工友来参加并加以支持，那就要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加强各抗战党派及工人的团结，消灭行帮偏见，积极发动工人参加抗战，增加战时生产。这些社论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指出了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为国统区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妇女统战工作方面，中共南方局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妇女运动的领导，于1939年2月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指派邓颖超为妇委书记，密切联系重庆各妇女团体，把握妇女运动方向，号召妇女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抗敌贡献力量。1939年2月8日，重庆市妇女团结联合会举行妇女界参政问题讨论会。邓颖超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民族解放亦须占有半数之妇女获得解放后，方能彻底。3月8日，重庆各界妇女团体在市商会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出席，并发表演讲，号召妇女运动走出狭窄的圈子，把伟大力量投身到民族的抗俄中去。1940年8月13日，重庆妇女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求精中学召开纪念“八·一三”及检讨三年来妇女工作的大会。邓颖超讲话，强调要加强妇女运动的团结，要下定决心，使全国三百多个妇女团体个个成为坚固的堡垒，要真有群众、真做事情，使中国妇女大众真能团结而不是徒挂空名！12月30日，邓颖超在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工作报告及检讨会上讲话，进一步研究了妇女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方针政策。

中共南方局对青年统战工作的领导也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统战工作搞得生气蓬勃，使国统区青年学生大部积极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并且发展为抗战后期的民主爱国运动。周恩来始终对青年运动予以巨大的关怀。1939年初，他在重庆南开中学友会上强调：青年对抗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青年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青年人要把天下存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1940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国统区青年工作会议，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中

中共中央青委根据重庆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是国统区青年运动基本任务之一。青年统战工作的对象应该首先选择青年易于接近者和关心青年者，主要是学校当局、各界名流与学生家长、青年的合法社团、国民党三青团之各机关，尤其是下级干部、团员和广大中青年等。进行统战工作的方法是：赞助上述各种人有利和无害的活动；进行各种组织与活动，尽量争取上述人士的指导、赞助、参加与合作，广交朋友，在学校尤须注意与国民党、三青团及学校当局交朋友。

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文化教育界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1940年秋，国民党对政治部第三厅越来越不满意，准备调走郭沫若，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向当局表示抗议，并提出辞职。周恩来一面鼓励郭沫若等沉住气，一面向当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交涉。张治中也认为挤走这些文化人的作法欠妥，决定取消三厅，在政治部下设一个从组织机构到活动范围都与三厅规模大致相当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对原三厅的文化人士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尽量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思想统一后，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下设文献编纂、艺术改进、对敌宣传三个组和一个主任办公室。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受到重重阻碍，但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它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宣传队伍，到前线、后方、乡村、城市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鼓舞了民众救国热情，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在文工委工作的文化人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不少充满战斗激情和胜利信心的文艺作品，在重庆等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1945年1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对记者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在召开国是会议之前，先召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党派会议，以便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真正实现的步骤问题。文工委决定发起和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对时局的宣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以扩大我党正义要求的影响。郭沫若起草了宣言，后经大家修改，以《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为题发表在2月22日的《新华日报》上，文化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签了名。《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并由紧急会议推选出于练人士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进言》的发表，把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周恩来团结和帮助文化界的朋友，鼓励他们为着伟大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940年10月19日，中华文艺界抚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化艺术社、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全国戏剧、电影、美术、木刻、音乐各界“抗敌协会”等十二团体，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出席大会。当晚，重庆文化界五十余人举行聚餐晚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值得我们学习：（1）律己严；（2）认敌清；（3）交友厚；（4）嫉恶如仇。周恩来号召大家，发扬鲁迅精神，团结抗战到底。10月，国民党解除了阳翰笙中央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使抗日进步影片的摄制工作陷于停顿。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导和帮助大批电影工作者转入戏剧战线，或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工作。12月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欢迎刚从各地到渝的作家茅

盾、巴金、谢冰心、安娥、徐迟、袁水柏等人，周恩来出席会议，向来自沦陷区的作家表示慰问和欢迎。1941年6月18日，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留俄同学会等团体，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晚会，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周恩来和董必武出席了晚会。周恩来亲自提出和组织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周年的活动，指示由阳翰笙、冯乃超、翁泽永、罗鬃渔、石凌鹤、朱海观等二十余人参加筹备组，联络“文协”、抗战剧社等团体积极开展筹备工作。1941年11月16日，纪念郭沫若五十大寿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冯玉祥致开会词，周恩来在会上致贺词。周恩来指出：郭沫若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一代，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他的著作和行动，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周恩来还亲自组织了戏剧家洪深的五十大寿、沈钧化的七十大寿等活动。洪琛一家三口服药自杀，周恩来立即派员前往慰问，并从经济上予以援助。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振“南社”，并愿意为他解决困难。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公开发表演讲和文章，抨击战时经济政策，揭露四大家族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的丑行，被捕下狱。1941年3月，他在狱中度过六十大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表达了中共对爱国文化人士的赞扬、肯定，及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的支持。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障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朋友的安全，周恩来和南方局把在重庆的郭沫若、茅盾、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一大批人送到香港。在桂林方面，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转告夏衍、林林、张尔华、廖沫沙等几十人赴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又指示廖承志、张友渔等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

者抢救出港。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人士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鲁迅逝世卅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同各界人士和文化界五百余人到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抗战胜利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法分开。他号召：文化界人士必须继续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新文化的发展。诚如鲁迅要求那样，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有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他再次要求文化界的人士团结起来，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这一时期周恩来对党的统战理论的贡献是极其丰富的，我们着重叙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增强对统一战线认识的自觉性。

周恩来提出，总结历史经验必须抓住基本问题，“就是要认清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应当抓住“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他又着重地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教

训出发，全面总结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成五个历史阶段，详细论述了以国共两党为主线的五个历史阶段的阶级关系及其斗争；论述了党在五个历史阶段上始终如一的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方针和策略，肯定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在这时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其成熟的标志就是；从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入手，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个根本问题；能够以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把一切可以团结和联合的力量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去打击坛主要的敌人。周恩来抓住最基本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着力于克服对统一战线认识的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他强调要提高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自觉性，才能做好统战工作，这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统战工作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周恩来指出：“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尤为复杂。但是，“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只有在复杂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周恩来强调，中国统一战线复杂性是一个突出特点，其他许多特点都是由它派生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在于敌人的复杂。中国革命不仅面临着封建主义这个敌人，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它们和备派军阀勾结，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和割据形势，又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复杂的不同的派系，这就使敌人的阵营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另一方面，参加统一战线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各个阶级都有复杂的特点，例如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和妥协性、软弱性的一面，这种两面性的特点在其上层、中层和下层其表现程度又有所不同。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是革命的，其上层也具有易于妥协的特点等等。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统一战线中，就是各阶级虽然因共同的敌人而有一致的目标，但又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又为着争取自己特殊的利益在统一战线中活动，这就使统一性只能是建立在复杂性基础上的统一性。不仅如此，统一战线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敌人和我们的营垒都是变化的。在敌人方面，他们反共反人民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使它们之间激烈争夺和不和，甚至会使其某一派系暂时地转到统一战线一边来。而统一战线中有的阶级又是可以分化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抗日战争开始后，它又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等等。不仅阶级关系是变化的，阶级的特点也是变化的。例如英美派大地主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它们只具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性特点，是主要敌人。但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这个派系便具有两面性。相持阶段到来的时候，其法西斯性又突出起来。而其法西斯性又和外国不同，具有中国的特点。至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是变化的。蒋介石曾经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说话，以后变化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汪精卫曾经是革命的，后来走到反革命和汉奸的立场上去了。因此，周恩来指出：“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看不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03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97 页。

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 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周恩来反复强调必须重视统一战线复杂性这个突出特点。他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 “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 “既然统一战线具有复杂性这个突出特点，认识这个复杂性，并且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内的复杂关系，就成为制定统一战线方针的出发点。

第三，周恩来深刻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周恩来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即担当起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 “天然领导权的思想 and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思想。周恩来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右倾的错误，就是不懂得领导权是争取来的，稀里糊涂地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具有的。“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就是要自觉地去争，主动去争，因为各个阶级也都是自觉地、主动地在争取这个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

周恩来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 大资产阶级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实质上是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引向光明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根到底，就是看谁能争取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来。领导权不是空的，要领导就必须要有被领导，否则就是“无兵司令”，“空军司令。” 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争取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时，“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 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方法和国民党有本质不同。“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 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实现领导权，能够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现领导。周恩来着重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特点：“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象和友军的关系一样。” “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 无产阶级要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的、不仅在实质上的、而且也在形式上的领导，只有在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之后。“如在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7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96、97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9、105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5 页、10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5 页、10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

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无产阶级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不可能有领导权。“一般他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sup>1</sup>例如，“他们的力量还小的时候”，他们“处在很困难的地位”的时候，他们需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帮助的时候，这时他们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sup>2</sup>“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sup>3</sup>

第四，周恩来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的报告，围绕统一战线中的敌我友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十点策略、四点方法和六条守则，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开展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化，以巩固统一战线。”这是周恩来在《提纲》中提出的一个深刻的策略思想。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要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首先必须分清这三种势力。但是，有时这三种势力的界限会不明显，革命群众有时也会认识不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面目。只有通过一定的斗争促使阶级分化，才能使其左、中、右的面貌分明，使广大群众认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的面目，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

《提纲》最早提出了对顽固势力的斗争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方针。这个方针是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所以是有理的、主动的，足以有效地打击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在统一战线中要有不同的批评，“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予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和必要的压力，以便其进步。”这是针对顽固派的倒退行为。“帮助友党、友军进步，首先要给以适时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并帮助其进步分子的发展。”这是以推动友党进步为目的。总的讲，就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是统一战线中的根本策略原则。

《提纲》把发展进步势力，作为争取中间势力的关键。

“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友军。”“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宁、晋冀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坚持全民的动员，首先在敌后游击区域及边区做出各种动员的成绩，以影响全国。”“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周恩来论述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形成完整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sup>1</sup>《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06页、107页。

<sup>2</sup>《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页。

<sup>3</sup>《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4页。

<sup>4</sup>《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sup>5</sup>《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页。

<sup>6</sup>《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页。

## （五）周恩来对解放战争时期统战工作的贡献

在重庆期间的艰苦工作 1945年8月,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周恩来和王若飞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具有与胜利前不同的特点,正如周恩来回顾说:“在抗战中是先从全体谈到局部,再从局部谈到全体。抗战胜利以后,先谈完了方针,然后再谈具体”。周恩来一开始就为两党谈判必须坚持平等的方针而斗争。9月21日,周恩来在谈判中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以不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但吾人今日既言民主团结,彼此即应立于平等地位,若谓‘我的是我的,你的亦应当给我’此非民主。即如昨天毛泽东同志与陈立夫先生谈话,陈即以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共图新中国建设等语相告,即系完全抹煞我党之地位,而为代表国民党之观念与精神。果如陈说,则我党一切皆应当交与政府方始满足”。

周恩来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坚决斗争,另一方面用说理的方法、摆事实的方法,主张双方平等商量的态度。他说:“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更多的离间,树立更多的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希望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国民党坚持在目前不能成立联合政府,不能普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不能提召开党派会议。虽然中共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实行普选等等均属正当要求,但考虑到国民党的困难,在谈判一开始就表示可以暂不提出。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一再采取商量的态度。周恩来说:“我们所提出的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我党仅为少数党,(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亦必仍限于少数党的地位,为此,我党干部之安插与党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发生问题。所以我党主张凡一省一市我党为多数者,其省政府主席与直辖市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此系为让步合作考虑,期使两党不致对立”。“我党所争者,惟在人事与组织,即于政令统一的原则下,我党只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而决非于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体制与法令系统,我今亟待解决者,为省、市区域与军队之数目而已”。正是这种平等商量的态度和努力,终于使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协定。这也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态度是认真的、诚恳的、坦荡的。

共产党人不为一党一群谋取私利。周恩来把共产党这种

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态度,概括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时的互相让步原则之中。他说:“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因此,中共方面在重庆谈判中,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主动让步。国民党代表

---

周恩来《国共会谈经过》《重庆谈判纪实》第353页。

《两党代表谈判情况》《重庆谈判纪实》第193页—194页。

《两党代表谈判情况》《重庆谈判纪实》第353页。

邵力子向重庆政协全体会议报告说：“讲到两方让步之点，有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在讨论实际问题开始时，周恩来先生即说明此次中共准备让步，不坚持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一月间所提条件，如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等问题。”“会谈纪要已有解决办法而尚待实施的军事问题，也是双方都有让由的结果，如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双方让步的情形十分明白，中央最初允许将中共部队整编为十二个师，因为在三十二年时，中共只要求编十个师或十二个师，三十三年时，中共也只要求编六个军，十五个师，这次中共最初要求四十八个师，最后折衷为二十个师，实在是双方让步的明证。”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也作了很大让步，同意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经过中共代表的艰苦努力，重庆谈判取得了一定成功。签定了《双十协定》。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由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946年1月10日，国共代表正式签定停战协定。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在致词中，要求国民党“痛下决心”，“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并表示，中共代表将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1月25日，重庆市沙磁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校、中大附中、重庆中学、蜀都中学、四川教育学院、国立艺专、育才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等院校，举行了促进政协成功的示威游行。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及各大学教授马寅初等一百余人、学生一万余人参加。游行队伍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七项国是主张。要求严格执行停战命令，实践蒋介石的四项诺言，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政协代表孙科、周恩来等接见游行队伍。周恩来发表讲话，完全同意各校学生爱国联合会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七项要求，并和大家一起为此奋斗。他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开头虽然达成了停战协议，不过要使内战完全停止，内战永绝，还要靠大家来努力监督；还必须做到使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化。他高度赞扬学生的行动说：“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学生是人民的先锋，你们的呼声是人民的呼声”，“你们要求一定要做到的，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一·二五”运动意味着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协代表的努力下，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决议。

国民党在签定停战协议时，坚持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周恩来为了达成东北停战协定，偕同张治中、马歇尔从1946年2月底到3月初，赴各地视察停战调处工作，历时七天，行程一万八千里。3月27日，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4月28日，周恩来出席重庆文化界200多人举行的集会，向他们报告了东北谈判的经过及共产党一贯的主张。周恩来十分感慨地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难的一段路！”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接见《大公报》记者时，总结了十年来国共和谈的经验教训，表示将继续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努力。他说：“明天我要

去南京继续为东北和平与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作法，因为两面作法只有增加新的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周恩来始终对民主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重庆政协前后的谈判斗争，充分体现了为和平统一事业不畏艰辛的奋斗精神。

在南京期间的艰苦工作 1946年5月5日，周恩来、邓颖超飞抵南京。当晚，在住地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东北停战商谈发表谈话，重申中共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并表示在两党重开谈判时，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內战。在南京，周恩来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一面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避免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而努力，一面又广泛地团结各界进步人士，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经常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中外记者和各方人士，向他们分析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向朋友们指出，中共将为和平民主尽够一切努力，只要有一分反对内战的积极因素，定不放过争取的机会。但是，共产党和人民也决不害怕内战。因为，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优势是暂时的，它们如果发动全面内战，必将为全中国人民唾弃，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人民必将赢得战争。周恩来对各方人士的团结教育，使他们透过战争阴云，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坚定了胜利的信心。正如当年郭沫若所指出的，梅园新村是沙漠里的“绿洲”，它使处在沙漠中的人看到了希望。

中共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的正义行动，也鼓舞和激励了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后，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相继爆发了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23日，上海反内战示威游行的群众推举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的包围殴打，发生了“下关惨案”。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亲自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第二天，周恩来在军事小组三人会议上郑重地报告了这一事件，并以备忘录分致马歇尔、徐永昌，提出了惩办祸首等六项办法。6月25日，周恩来通过延安发电指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及王维舟等，要求中共四川省委要注意保护文化界朋友的安全。“倘时局再恶化，应设法安顿文化界朋友”。电报对安顿重庆的文化界朋友提出具体办法：“一、疏散到外县。二、到上海或香港，除毫无社会关系不能移动者外，尽量离渝。”

“下关惨案”对民主人士是极大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对蒋介石保证要实行政治民主化的虚伪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中有的人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我认识到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颗。马叙伦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们是中国真正的民主势力，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大爆发。当晚，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向民盟负责人介绍了目前的局势以及中共对整军方案的对策，鼓励民盟朋友继续为和平民主而努力。6月30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与会记者散发了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书面谈话，并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有关时局的各项问题。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政策，遭到全国人

民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运动采取血腥镇压。7月11日，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在昆明大兴街口被国民党特务枪击重伤，于次日晨逝世。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凶耗传到南京，周恩来极为愤慨，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周恩来指出，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之被暗杀，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但他们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和民主人士，真是卑鄙已极！

周恩来对爱国民主人士人身安全，表现了极大的关心。他要求国统区地下党，要把做好这项工作当做重要任务来抓。7月25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在上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身亡，周恩来赶到医院时陶行知已经断气。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说：“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个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他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一生，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建议中共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各地下党组织，切实加强进步朋友的保护工作。“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

周恩来不仅关心着进步人士的人身安全，还要求共产党组织对进步人士“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9月3日，他在与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直接与沪地人士接触，深感一般政治认识大有进步。”他指出，反动派的内战政策和行动客观上为我们争取中间人士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但我们的工作仍是十分重要的，要向他们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帮助他们提高认识。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单方面召开了伪“国大”。为了抗议国民党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行为，中共决定将代表团撤回延安。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向中外记者痛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宣布中共将针锋相对，坚决自卫，誓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19日，周恩来离开南京时，向朋友们充满信心地宣布：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极其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彻底失败了。国共分裂的结果不是统一战线的缩小，而是更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扩大。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并提出八条作为谈判基础。蒋介石被迫“引退”，代总统李宗仁宣布接受八条。4月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率领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月1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首先由周恩来把中共以毛泽东的“八条”为基础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团。周恩来指出，尽管国民党政府对发动内战应当负完全责任，而在两年零十个月的战争中，国民党所统率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

民解放军所击败，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具体原则的基础上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以求得国内和平民主。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团指出：如果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这是一个应该的、合理的、公平的、人民的结论。周恩来强调说：我们相信这个协定变成正式签定的文件时，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一切民主力量，他们听到了，一定欢欣鼓舞。

在谈判过程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听取了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在许多大问题上，凡是能够妥协的，也作了尽量妥协。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也公正地认为中共确实是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的，是宽宏大量的。他们对《草案》提出的四十余处修正意见，中共接受了一半以上。《协定》所提出的条款，确实“不囿于一党一派一系的私利”，是“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的，因此应当“毅然接受”。

但是，南京政府终于拒绝了经国共两党代表团反复协商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平谈判再次宣告破裂。

在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周恩来仍然十分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发展和它的重大历史作用。他在向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们合作。”<sup>1</sup>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一次谈到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他指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他要求青年团员要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模范，切不可画地为牢，只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

周恩来还着重指出，在胜利的时候，思想上仍然必须牢牢树立和党外朋友合作的思想。“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周恩来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时，认真地贯彻了这个方针。平津战役刚结束，1949年1月3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样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处周子健等，通知他们，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订，要他们连夜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政协；同时让住在李家庄的一批民主

---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169页，第179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20—123页。

人士一起到北平。2月8日，北平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民主人士和中共领导人一齐登上前门箭楼，检阅了入城部队。2月26日，又召开了欢迎各民主党派人士的会议。5月24日，周恩来宴请在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代表中共中央同他们协商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等重大问题。周恩来还指示南方的共产党组织，要保护好民主人士，不要让国民党伤害他们或把他们裹胁走。在重庆，中共地下党将一批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送到香港，又由香港护送到北平。例如胡子昂就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由重庆经由香港转道北平的，钱昌照也是由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安排由香港到达北平的。周恩来还建议并偕同毛泽东到火车站迎接宋庆龄和程潜到北平。在考虑政协人选时，周恩来作好周密的、细致的安排，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考虑了进去，凡是在人民革命事业中作出过贡献的组织和朋友，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因此，使政协真正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大团结的会议。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宣读了开幕词，周恩来代表筹备会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而结成的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民主革命取得了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结果，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结果，是对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也是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在筹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过程中，周恩来周密考虑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指出他们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长期斗争中做出过应有贡献，因此应当把他们安排到政府中来。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解放前一直拒绝做官的年过七十岁的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愉快地出任政务院付总理兼工业部部长职务。在民主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老同盟会员李书城担任了农业部部长。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特殊贡献的傅作义，不仅安排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而且任命为水利部部长。凡是傅作义推荐的人也给予妥当安排。周恩来对各方朋友都给了极大的照顾，使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和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府机构。在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占了相当比重：在四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员二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二人；在二十一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十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十一人；在政务院下属三十个机构的九十三名负责人中，共产党员五十一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四十二人。许多民主人士都交口称赞周恩来的周到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

## （六）周恩来对新中国统一战线所作的贡献

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要发挥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也发生了变化。

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呢？周恩来指出，这就是最大的广泛性。他说：“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需要统一战线，而且需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具体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建立两个联盟，从而建立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必须和其他劳动者建立巩固的联盟。周恩来引证列宁的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团结联盟，……

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社会主义是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完成，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如果不和其他劳动阶级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建立联盟，这个任务是根本不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阶级的联盟，最核心的是工农联盟。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民阶级又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力之一；无产阶级必须帮助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工农联盟是劳动者联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者的联盟才能得到巩固。在劳动者联盟中，有一个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指出：第一，中国的工会历来就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如此。1950年，在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曾发生过工会是否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争论。周恩来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但有没有统一战线性质呢？应该说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讲过这个问题。欧洲有许多工会其本身也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它把很多不同政治主张的党派及其分子组织在一起，使他们统一行动。中国情况较为复杂，早期的工会甚至有宗教性和落后性的派系组织。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工会强调阶级教育，不同政治主张的差别并不大，但这里仍有统一战线性质。如劳协也包括在工会之内，同时工会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分子，现在还把知识分子组织进来，民主党派分子也会参加进去。”因此，中国工会既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第二，由于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党和非党的联盟，虽然政治主张的差别不大，但仍然有统一战线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31—432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3页。

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

通过工人阶级内部的联盟和工人阶级与劳动者最广泛的联盟的建立和巩固，就首先使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特点。其次，周恩来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联盟的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而且“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非劳动者的联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也是实现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伟大战略措施。周恩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相同，但面目不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除极少数人跟随蒋介石外，许多代表人物站到了人民方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全国解放后，在三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历史，决定它不仅

在民主革命中，就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应当团结它，肯定它拥护新政权的积极作用，和它建立统一战线。它的代表人物“参加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历史发展而来的。”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消灭资产阶级。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这样一个地位：“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共产党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把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作为兼顾二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是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的一个创举。周恩来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也是改造资本家个人的过程。阶级消灭，个人改造，最后都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这样做，马克思主义是允许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资产阶级能够向工人阶级和平屈服，那是最便宜不过的了。”

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具有广泛性的根本特点的论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把统一战线尽可能地扩大到一切领域，对于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对于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广泛性这个根本特点，使我国各族人民、各阶层、各方面人民的团结出现了一个空前宏大的局面。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20 页。

同上书第 413 页。

同上书第 235—23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25 页，第 222 页。

同上书，第 296、267 页。

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新时期的统一特战线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其对象和范围更加广泛了。这种广泛性表现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不是阶级间的联盟，而是一种崭新的政治联盟。它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联盟，也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在劳动人民内部建立的政治联盟。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成为这种政治联盟的牢固基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统一战线中的总题目。因此，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把全国最大多数的人团结起来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成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

实现祖国统一的设想大陆与香港、台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实现祖国统一，采取什么方式？这是周恩来早就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周恩来在香港问题的处理上，提出了如下重要决策：第一，香港在目前和将来较长的时间里，“都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应当把香港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港口，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等等。第二，同香港的企业家、资本家长期合作，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不能把内地的政策不加分析地搬到香港去，不在香港开展内地那样的运动。“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应当在香港实行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第三，应该允许香港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长期存在，允许来去自由，这是实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重要保证。周恩来指出：“香港的生活方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带有腐化性。有些朋友想要出去过一阵也可以，我们不要抓得那么紧，但也不去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迫回来，也不强留。”第四，对香港的政策要长期稳定不变，使香港各界人士和人民对香港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信心。“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sup>①</sup>周恩来关于处理香港问题的决策具有远见卓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周恩来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思想，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实现。经过中英双方两年的谈判，1984年9月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签定了联合声明协议。这个联合声明和它的几个附件在同年十二月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联合声明规定，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双方保证在1997年以前及以后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五十年内维持不变。预计五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大陆和香港的生活水平不在存在什么差距，那时，两种制度的问题就解决了。邓小平说：“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如果有什么

---

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页。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4页。

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4页。

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4页。

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

关于台湾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周恩来就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案。他在 1956 年 6 月 28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

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巨大发展。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在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从而提出了组成包括赞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一千九百万台湾同胞、五百多万港澳同胞和三千多万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也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伟大发展。“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就是通过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邓小平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收回，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把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最基本的方针，以承认和准备与台湾、香港的资产阶级长期合作为前提，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个战略构想，反映共产党人宏伟广阔的胸怀，并且从实际出发，赋予了统一战线新的内容和新的历史任务，在新的时期突出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这正是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的逻辑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贡献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地方。

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并和民主党派建立了长期的亲密合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模范；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进一步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发展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的思想。

第一，周恩来分析了中国民主党派的特点。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因此不可能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般说来，各民主党派既是一个阶级联盟的组织，又是一个政治联盟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的政党。例如：“民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集团，在阶级关系上有阶级联盟性质，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有极少数劳动

---

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46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18 页。

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17 页。

同上书第 30 页。

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封建分子，而以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走今天这样的路，民主党派也必定是今天这样的类型，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民主党派的性质有了根本转变。这些政党中的绝大多数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已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而原来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劳动者。这样，原来的民主党派其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当然是有必要的。

周恩来指出，这时“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它们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政党。“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必要性在于：“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周恩来举例说，民革能跟原国民党出生的一些人发生密切联系，民盟在知识分子圈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九三学社联系的科学家比较多，民建主要联系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民进联系中小学教员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象。周恩来指出：“不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有不同的。”“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

周恩来关于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其性质已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论断，曾经被“左”倾错误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恢复和肯定了周恩来的正确论断。他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把民主党派看做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第三，共产党在处理 and 民主党派的关系时，必须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周恩来指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共产党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能不能说共产党多活几年，其他党派少活几年？如果这样想，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了。”“我们没有理由说谁先结束，谁后结束。”“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

---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71 页，第 179 页。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38 页，第 348 页。

、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49 页，第 349 页，第 350 页。

《三中全会以来》上，第 154—155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78 页。

政党时候为止。”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起努力，为完成消灭阶级、国家、政党的任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既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共同存在，就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的方针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根本方针。周恩来指出，长期共存，必然就有一个互相监督问题，共产党是执政的大党，因此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当然，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还要其他党派来监督。同样，每个党员也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

周恩来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  
“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我们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并且使下级对上级也能够有监督的责任。”  
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实行监督，就是承认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就是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真正表现。当然，监督是互相的，共产党也有帮助和提醒民主党派的责任。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互相成为“诤友”，“畏友”，不能成为“癖友”，“佞友”，互相都应当尽到批评帮助监督的责任。共产党在原则问题上也决不能迁就党外的朋友，必须进行说服、批评和帮助。就是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帮助民主党派克服某些不正确的东西。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加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从而扩大和发扬人民民主的重大意义。胡耀邦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民主党派长期形成的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处理相互关系的根本准则。

第四，周恩来论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要有共产党对各方面的领导，包括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被肯定下来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但它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仍然还是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派一方面和共产党有平等的关系，并且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仍然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指出：“各民主党派应该以‘承认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作为领导思想。”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不是部一个人来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必须制定成政策，才能算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因此，在个别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家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只存在互相交换意见的关系，共产党员不能以领导者自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0 页，第 351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247 页。

同上第 436 页。

居。为了要实现共产党的正确的集体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为此，共产党员必须广泛地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虚心向他们学习，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把这些意见集中到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来，才能帮助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周恩来特别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情很多，个人的活动范围也很大。”强调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放手让它们开展工作，这是周恩来坚持的一贯方针。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周恩来指出，人民政协组织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总部。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建设新中国，必须经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人民政协不能搞清一色的人物，要通过这个组织团结各方面的人士。所以，“政协名单里面什么人都有，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方面的人，只要他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sup>①</sup>要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精神。早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以前，周恩来就强调民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点。“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 and 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sup>②</sup>以后，他多次强调民主协商的重要性：“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协商是以民主为前提的，要真正实行协商，就必须广开言路，大力发扬民主。所以政协的精神就是民主协商的精神。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的精神、动员广大的力量来发扬民主，才能极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搞好国家建设服务。

周恩来还为政协发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用提出两项具体的经常工作。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sup>③</sup>其次，要搜集近代文史资料，敌我友三方面的材料都要有。

关于共产党在人民政协中起领导作用问题，周恩来指出，这就是要善于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使各方面的人士认识和接受，要通过发扬民主，广交朋友，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经常交换意见，把各种意见集中起来，使共产党的政策更切合实际；共产党员在政协中要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边当学生，边当先生，要“严于律己，宽于责人”。

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思想，在新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央指出，新时期的人民政协工作，要进一步发扬统一战线的民主传统和作风，要加强政治协商、实行民主监督、搞好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实行自我教育等等。这就把我国人民政协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90 页，第 137—138 页，第 262 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90 页，第 137—138 页，第 262 页。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26 页，第 262 页。

